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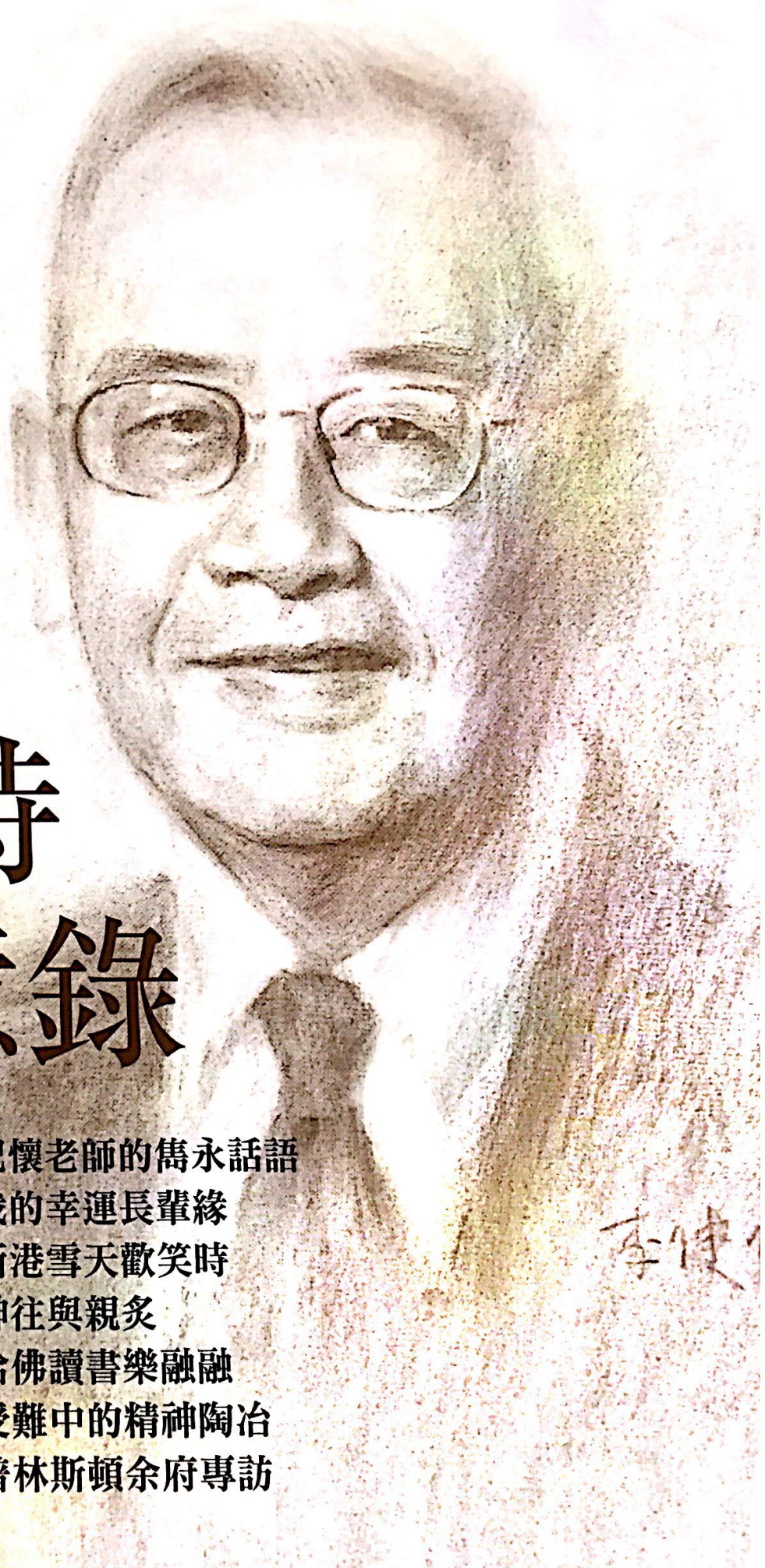
# INK

Literary Monthly  
October 2018

182

第拾伍卷第貳期

印刻文學生活誌



獨家發表

# 余英時 回憶錄

- 王汎森：記懷老師的雋永話語
- 朱敬一：我的幸運長輩緣
- 周婉窈：新港雪天歡笑時
- 陳弱水：神往與親炙
- 黃進興：哈佛讀書樂融融
- 蘇曉康：受難中的精神陶冶
- 廖志峯：普林斯頓余府專訪

ISSN 1728929-7  
4 1714102 689648  
NT\$340元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 余英時 回憶錄

封面專輯  
COVER  
STORY

公認融會「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的學術泰斗，並獲譽為當代知識人典範的余英時教授，近一年多來，陸續在香港刊物披露回憶錄——〈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香港與新亞書院〉。最新完成的篇章〈美國哈佛大學時期〉，本刊非常榮幸，取得獨家發表的機會，藉用華人文化圈流傳的贊詞，「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裡，至少我們還有余英時」，或足以略表我們此刻心情的敬慎和欣悅。

余英時教授的嫡傳門生、私淑後輩，亦紛紛執筆共襄盛舉，包括王汎森院士、朱敬一院士、周婉窈教授、陳弱水教授、黃進興院士，以及旅居美國的報導文學、散文兼評論家蘇曉康先生，除問學師承之外，且也述說他們各自與余教授私下家常往來的軼事逸聞，頗有《論語》古風，活潑、雋永又溫馨。

編輯人兼作家廖志峯，剛剛九月中下旬，飛越重洋，親至普林斯頓余府專訪，攜回第一手報導跟攝影照片，他掩不住興奮，聲稱這段路程是「走了近三十年的朝聖之旅」，可謂道盡了編輯同行的執著跟喜願。

〈美國哈佛大學時期〉分上下兩輯，本刊十月號、十一月號發表後，將收入允晨出版新書《余英時回憶錄》。





李健儀

李健儀 / 繪圖

October 2018 INK 29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專訪】

# 一個編輯， 走了三十年的朝聖之旅

台北·廖志峯·文、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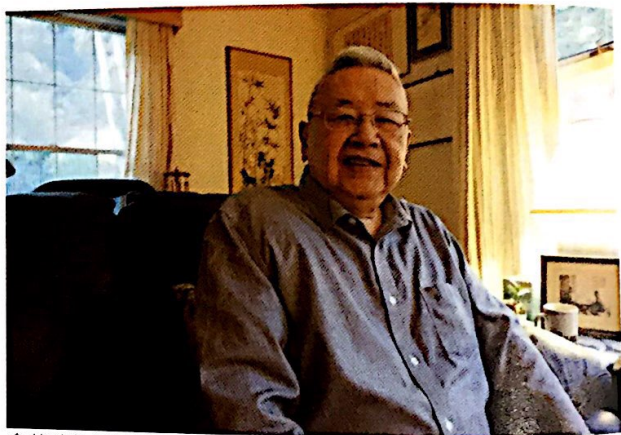
終於坐上前往普林斯頓大學的火車，展開一次想了許久卻始終不曾真正踏出的旅程，火車從紐約賓州車站發車，車程約一個多小時，然而，對我來說，這段旅程，在我心裡走了很久。

美國長春藤聯盟名校普林斯頓大學，一直是許多青年學子嚮往的殿堂，發明原子彈的愛因斯坦，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數學家約翰·納許（John F. Nash, Jr.），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都曾在普大任教。但對華人世界來說，更重要的，是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也是第一屆唐獎得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在此春風化雨；他不但是人文學術的指標，也居人格者的高位，多年來堅持反共，始終如一，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沒再踏上中國故土。這樣一位風骨超卓的學術名家，要出版回憶錄，又豈是勝事一詞足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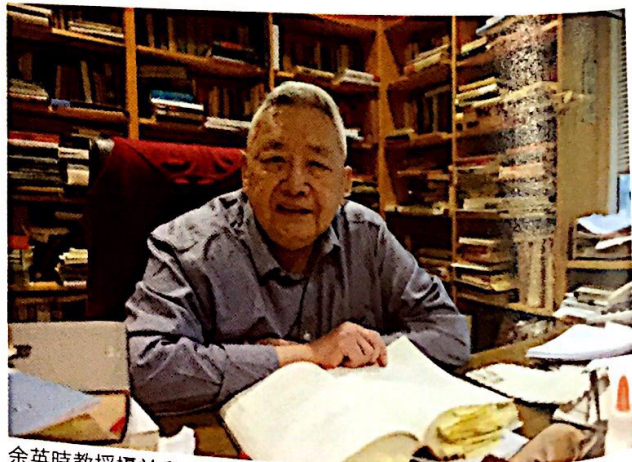
余英時教授說他從沒想過寫「回憶錄」，我相信。然而，有一天，記者作家李懷宇，開啟了因緣。二〇〇七年，李懷宇從中國出發，前往美國東岸，訪問了余英時、夏志清、張充和、孫康宜等多位重量級教授，他們不管在歷史，文學，藝術諸領域的探索研究，都是望重一方的碩學鴻儒，這些訪談後來結集成《知人論世》出版。然而，李懷宇在普林斯頓大學停留的五天中，與余教授三次長談，返回中國

後，又多次電訪，寫成了二十萬字的《余英時訪談錄》初稿，這份初稿我始終未能一睹。就是這份初稿，觸動了余教授自己寫下回憶錄的契機，這樣的出版旅程和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可謂前後呼應。

多年來，出版余教授的學術著作，和他介紹的書稿，如康正果的《出中國記》，巫寧坤的《一滴淚》，以及陳穎士的《蠹餘集：汴梁陳穎士先生遺詩稿》外，我鮮少和他多說話，通常是藉由傳真，簡單報告編務上不解之處。



余英時教授精神奕奕，攝於窗明几淨的普林斯頓寓所客廳。



余英時教授攝於私密的書房，特別破例讓本文作者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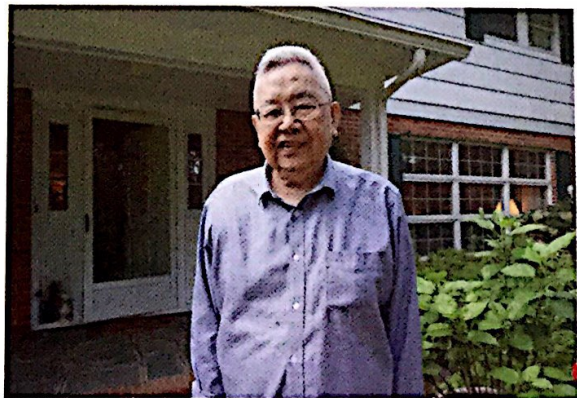


余府書房窗外綠樹綠茵如圖如畫，窗櫺懸掛張充和教授所贈鄭板橋手蹟「小書齋」。

他是華人心中的人格指標，一種文化典範的依歸，常有許多人找他，便也不想占用他太多時間。我雖然焦慮著「訪談錄」的出版命運，不知余教授何時可改定，但又不好直問，只能暗自苦惱。去年間，忽然接到余教授打電話來，開口就說：你不要著急，我的回憶錄會交給你出版。這通電話讓我空懸的心著實了起來，那種幾乎要感動落淚的心情，是我出版生涯中難得的體驗，此生難忘。余教授既然說出口了，我也不好續問何時可以出版，就這樣一直到了今年。余教授的稿子是催不來，急不得的，當年他為朱熹八百歲冥誕所出版的點校本《朱子文集》寫序，一寫三年，寫成了一套三十萬字的學術鉅著《朱熹的歷史世界》，意猶未盡，續寫《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是學術界的驚奇，更是讀者之福，我只能等待時機。今年三月間，余教授已有四大篇憶往文章先後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明報月刊》上刊出，感覺出版似乎有了眉目。之後又接到中研院黃進興副院長轉來余教授最新的手寫影印稿，我估量一下字數已有十一萬餘字，段落又剛好落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結束，於是徵求了余教授的同意，先出版上篇；下篇再等余教授蘊釀寫成。幾乎同時，《印刻文學生活誌》初安民總編也來問《余英時回憶錄》的發表事宜，於是新寫出的文章就由《印刻文學生活誌》獨家刊登。

赴美拜見余教授之前，十分忐忑，當我終於有機會單獨面謁時，我應該要說些什麼？聽說余師母要開車到車站接我時，更是嚇壞了：這……怎麼可以？行前接到余教授電話，我把自己的疑慮告訴他們，余師母說是小事。當我終於抵達普林斯頓時，整個心奇怪地放鬆下來，也許是滿眼綠意，更也許是濃重的人文氣息讓人心靜。在車站接我的是周質平教授，我出版了他的《自由的火種》，廣獲好評。這次到普林斯頓，除了余教授夫婦以外，我沒對其他作者說，我好奇周教授怎會知道？他說是余師母告訴他的。

周教授先帶我去看余教授當年的研究室所在，而隔壁的研究室，曾是愛因斯坦使用，我後來才知道，余教授當年的書桌是愛因斯坦用過的，太神奇了。大師的桌子，如今不知流轉何方？電影《美麗心靈》也在層樓開拍，這裡的環境氣息，讓我十分著迷，我忽然想，如果我也在這裡停留，我會成為一個學者嗎？好想



余教授近年來甚少外出，僅偶而在屋前庭院走動。





余府屋後樹林幽徑，余教授當年手栽唐竹已成叢叢幽篁。

再好好讀書。余師母和我們一起午餐，飯後，余師母先載我去墓園問事，然後才載我去見余教授。墓園寧靜優雅，這裡有一些朋友，余教授的父母親，余協中教授夫婦也安葬在此。余師母在其間走動，十分自在，像是探望朋友，她說她有時也來幫朋友的新墳澆水。我說：師母真的很辛苦。她說：怎會辛苦？我做得很快樂。我深刻感覺到她這種正向開朗的態度，像秋日午後溫煦的陽光。



踏進余教授的家中時，他已站在門口等了，心中忽然湧上了阿姆斯特壯的名言：這是一小步，也是一大步。感慨無限。我脫鞋子進屋，他說：我們家不脫鞋。於是，我又穿上鞋子，



難得上館子吃飯的余教授夫婦，宴請本文作者留影。

直接踩上他家的地毯，踩得心虛。清雅明亮的廳堂，被綠蔭圍繞，十分舒適，坐下來就不想動了。書稿已經校好了，稿子了上面貼滿師母所謂的「小國旗」。我們都覺得書名用「余英時回憶錄」直接又明瞭，不過他還沒題好字。他說：心情不對。我說：沒關係，滿意了，再給我。他突然說：我也會寫幾個字給你留念，我知道你自己不會開口的。我當下愣住了。沒想到他會這麼說，那一刻覺得彼此的距離很近。余教授通常下午見客，但不能聊太久，聊久了，氣不足就有些氣喘，讓人心疼。他笑說：我現在是英雄氣短了。所以要開始兒女情長了，我接著說。「兒女情長」，他呵呵笑著，重覆講了一次。余教授雖說自己英雄氣短，但文章寫來文氣酣暢，底蘊深厚。余教授當年為《一滴淚》寫序，曾提到「心史」的概念，鼓勵巫寧坤先生繼續書寫。然而，「心史」的概念正是《余英時回憶錄》的敘述主軸，少寫生活細節，而更著重在知識分子學思之路的精神轉進中，含金量十足。

我們雜談魯迅，張愛玲，錢鍾書；也談臺靜農，殷海光，談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選擇。他最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覺得十分深刻；他不懂張愛玲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談，而且談這



麼久？我說；您問王德威教授會更清楚。祖師奶奶的部分，我還是別亂說的好。他認為張的《秧歌》寫得好。大學時曾讀錢鍾書的《管錐篇》、《談藝錄》，但根柢不足，只當閒書看，領會不多。我們天南地北閒聊，離不開中國，台灣，放開心來談，談得自在。他很意外我們

居然沒這樣聊過。他說：我現在的力氣只能專注在學術論文的英譯和回憶錄的書寫了，當年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是意外，本來我的老師錢穆寫過的，我是不想再碰的，沒想到一碰，工程浩大，借了許多書重讀，書多到鋪滿地上。余師母接口說：那幾年，我們就住在宋朝裡。

我們從下午聊到晚餐，進到餐廳繼續聊，余教授夫婦心情很好，竟點滿了一桌菜，難怪，一進餐廳，雖然只有三個人，也堅持要坐圓桌。真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如果沒有過去埋首紙頁編書，恐怕也踏不了這一步；然而，這一步，我走了將近三十年。餐後，餐廳送來了幸運餅乾，我挑了一顆，余教授幫我讀了餅乾中的小詩：It is necessary,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這趟旅程其實是一個編輯的朝聖之路。我重新洗滌自己，滿懷感恩。 INK

### 廖志峯

出生地台北市，居住地基隆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分班結業，曾任廣告公司文案、國會助理、編輯，現任允晨文化發行人。喜歡旅遊、看電影、漫步和攝影。文章、隨筆散見報章雜誌。著有《書，記憶著時光》、《流光——我的中年生活》。



余教授岳父陳雪屏先生題贈對聯，集自蘇東坡詩句與陸放翁詞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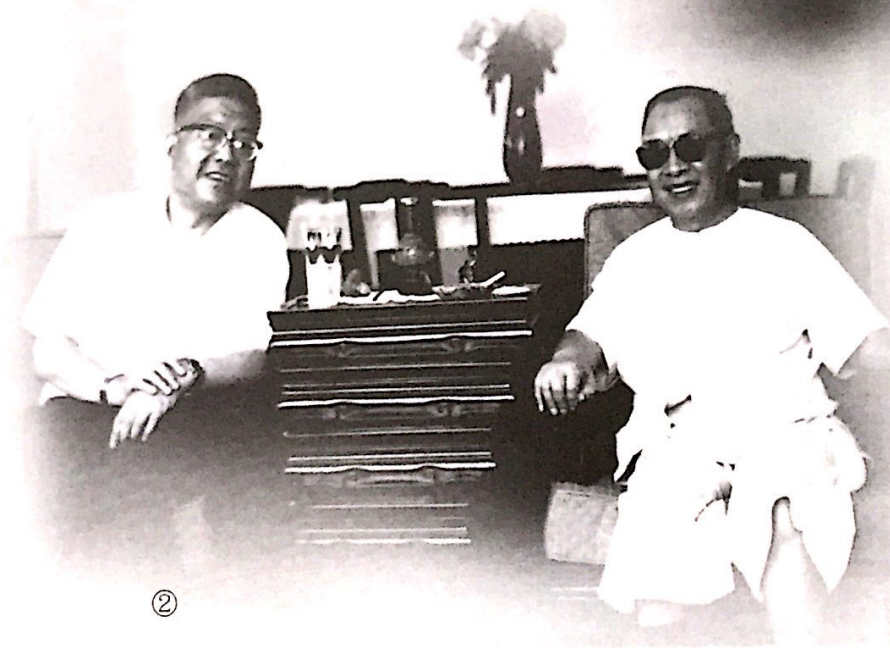




①



③



②



1. 一九四七年余英時與二伯母張韻華女士合照。
2. 余英時兩位業師，右為錢穆先生，左為楊聯陞先生。
3. 一九四四年余英時攝於安徽潛山縣城。
4. 余英時一歲時（一九三〇年）所穿的虎面繡花鞋。
5. 余英時母親張韻清女士肖像。
6. 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余英時（右三）從香港啟德機場搭乘泛美航空飛往美國，時年二十五歲。
7. 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西山大屋，余英時在此渡過七歲至十六歲的青少年時代。







⑥

# 余英時 回憶錄

普林斯頓·余英時·文·照片提供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 美國哈佛大學時期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們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沒有動過出國讀書的念頭。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國哈佛大學去進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關於這件事，賓四師曾有過一段簡述，他說：

哈佛燕京社先於四十三年（編按：民國），來函邀請新亞派一年輕教師，在三十五歲以下者，赴哈佛訪問。詢之港大，並無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亞一校獲此邀請。以新亞教師無年輕合格者，姑以年長者一人亦曾留學美國者，商其同意應之。哈佛以不符條件，拒不納。翌年，又來函邀，遂以新亞第一屆畢業留為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派送前往。一年期滿又獲延長一年。又改請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之第一人。（《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三二〇～三二一）

錢先生所述大體正確，但細節仍不免有出入，讓我藉此機會用我自己的記憶作一補充。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鎮雄先生奉賓四師之命，到研究所來找我。他在耶魯大學讀過書，也在新亞任教，但這時又兼任學校的英文祕書。他帶來了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致新亞的全部文件，讓我細讀，然後決定是否願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原來哈燕社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叫做「訪問學人計畫」（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根據這一構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韓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人到哈佛訪問一學年。他們有聽課和研究的自由而無考試的義務，一年之後仍可申請延長一年。但訪問學人在年齡上則有較明確的限制，即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可知此一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中年學人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當時哈燕社每年計畫招收十一、二位訪問學人，多數來自日本，一兩位來自南韓，香港和台灣則各有一人。（台灣最初只有台灣大學一處受到邀請，後來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師範大學兩處。當然，提名並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進一步告訴我：學校鑒於上一年的推薦因年齡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並無改變，仍是年長者過之，年少者不及，因此決定同時提名唐君毅師和我兩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擇。這一年，君毅師四十六歲，我則二十五歲，恰恰是他過之，我不及，因此我雖然



最後同意一試，並且為提名試寫一篇很長的進修計畫，但我對於去哈佛的事卻未抱一絲一毫的期待。我有兩重很堅強的理由：第一、「訪問學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學術研究方面已取得相當成就的人，所以至少當在三十歲以上。而我當時則是大學畢業不久而剛剛開始接受研究訓練的年輕學生。第二、唐君毅師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學家，而我連一篇具有原創性的專題論文也沒有發表過，如何能與他相提並論？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種榮譽和鼓勵，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設想。

但萬萬想不到的是：兩個月後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長葉理綏（Serge Elisséeff）的正式公函，邀請我在秋季到哈佛訪問。信中還特別註明，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況並增進英文說與寫的能力，我可以提前兩個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學校。這封信當然使我喜出望外，但當時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為什麼能夠入選？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幾個月之後，才知道哈燕社的「訪問學人計畫」是把重心放在年輕學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們學與思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所以我的年齡不足和學尚未成反而是這次入選的主要原因。同時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絕了新亞的提名，這次又提名二人待選，出於對新亞特殊處境的同情與支援，他們才破例接受了我。

上引賓四師回憶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薦了「年長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這裡也許應該補充一下。這位老人便是陳伯莊先生。陳先生是和胡適、趙元任等同年（一九一〇）官費留美的，他的專業是化學工程，但回國後轉而在經濟、交通各方面發展。抗戰勝利後他出任京滬鐵路局長，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難南下，定居香港。但從這時起，他的興趣轉向杜威哲學和社會科學。他一方面在新亞兼一門社會學的課程，另一方面則創辦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現代學術季刊》，以研究和翻譯西方最新的人文與社會思潮為主。當時他自己集中精神研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新著《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一書。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討論，而《現代學術季刊》也為我開了不少眼界。他因為編《季刊》的關係，很希望到美國訪問，以便和各大學有關教授商討譯介新思潮之事。這是他同意新亞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與哈燕社計畫不合，又兼年事過高，以致未能實現。關於這一經過，胡適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給楊聯陞師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說：



新亞書院推薦的一位，我聽說是陳伯莊先生（P.C. Chun）。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國內做過許多大事業，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來他專心研究Dewey一派的思想，讀了無數的哲學書，所以想出來找些人直接討論討論。他的年齡與元任同歲，我怕他不能合格。（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五五八。有關陳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可讀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適的序。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楊先生與「訪問學人計畫」有關，胡先生特別和他討論陳伯莊案，似有為他說項的用意。陳先生訪美之願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實現，因為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決定支持他編譯新思潮叢書的計畫。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暢聚了一兩個月，我並且同意為他的叢書編譯一部有關歷史哲學的論集。可惜他回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時期對我發生過正面影響的一位前輩，所以補記於此。

從三月尾開始，我積極辦理去美國的法律手續，想不到碰到了極大的阻力，幾乎不能成行。原來當時在台的國民政府和美國國務院之間存在著一個協定，即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去美國，必須用中華民國的護照。依照這一協定，我不能不通過台灣的教育部和外交部申請出國護照。但台灣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員不經過任何調查，也不曾找我詢問，便已祕密呈報台北政府，說我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到美國後必將發出對台灣不利的政治言論。這樣一來，我的申請便被擱置在一旁，無論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覆，有如石沉大海。賓四師後來瞭解到這一情況，還特別寫了一封懇切的公函給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檢一關不能通過，也沒有發生絲毫作用。申請案一直拖了六個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開學之後，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護照已是確定無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幾年雖在所謂「第三勢力」刊物上寫過不少文章，卻從來沒有一個字涉及國民黨。我的作品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倡導民主自由的價值，上面已經說過了，不必再談。

我的困局當時在香港傳布得很廣，最後連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James Ivy）也知道了。艾維很尊重賓四師，一九五三年亞洲協會出資試建新亞研究所便出自他的決定。因此他通過賓四師，傳話要我去和他當面一談。在瞭解了全部情況之後，他自動地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Everette Drumright，後長期在台北任美國駐華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訪問是一個青年學人一生難得一遇的進修機會，不應因技術性問題而喪失。於是莊萊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給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師，當面宣誓自己是「一個無國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再由律師寫成正式文件，簽名其上，以代替護照，美國領事館便可合法地在這一文件上簽證。



這一「無國籍」的身分給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難。我每年都必須到移民局去申請延長，當時持有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員每次必詳細追問，並一再警告我不能離境，一離境簽證便失效了。這一情況直到十幾年後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終結。

## 一、初訪哈佛

我第一年在哈佛的正式身分是「哈燕社訪問學人」，所以本節題作「初訪哈佛」。

由於上述護照問題的延誤，我遲至十月三日才離開香港，哈佛則已經開學了。艾維先生為了照顧我，特別安排舊金山亞洲協會總部派人接機，並請我在舊金山多留一天，認識一下美國西岸的情況。所以我入境之後，協會工作人員 Robert Sheeks（漢名許樂柏）先生已等在外面，手持名牌，待我前去相認。當天晚餐後他送我到旅館休息，第二天上午又開車帶我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Berkeley），說是為了讓我先看看西岸著名大學的校園，可以和東部的哈佛作一比較。我在加大參觀了東方圖書館，恰好館長是房兆楹先生。他是燕京大學的早期校友，和我的父親同受業於洪業（煨蓮，William Hung）先生，所以對我很親切，並找出一些善本書讓我過目（我記得其中包括貫華堂本《水滸傳》）。十月五日下午許樂柏又親自送我到機場，直飛波士頓。我對於許樂柏真是感激萬分，可惜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重見。一九六四年他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太平洋科學會（Pacific Science Board）副主任，在台灣主持中美科學合作事務，最後則進入國務院，主管與中國有關事務。



### 哈佛燕京學社的接待

許樂柏前一天已打電話通知哈佛燕京學社，我的班機號碼和到達時間。他轉告我說：哈燕社將有人接機，讓我放心。但開車來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長裴爾澤（John C. Pelzel）。他是人類學教授，以研究日本工業化以後的社會變遷，聞名於時，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長。原來哈燕社成員都是研究中國、日本的教授們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發文件的祕書外，並無其他專業職員。裴教授在車上給我詳細指示，怎樣在生活上安頓下來？怎樣在哈佛選聽課程？怎樣利用不同的圖書館？但他一再強調：我擁有完全的自由，無論是研究還是聽課，全都自作主張，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最後他又問我認不認識「Professor Lien-Sheng Yang」？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楊聯陞先生的姓名，我只能實話實說。他的反應似乎相當詫異，但他並沒有說話，我是從表情上看出來的。當時楊先生在西方漢學界，特別在美國，幾乎無人不知。我的孤陋寡聞大概超出了他的想像。

大約在十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哈燕社召開了一次「訪問學人」集會，除了五四、五五兩屆學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參加過審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葉理綏社長致詞，說明計畫的性質等等。在答問時，他講了一個極有趣的真實故事。有一位申請人不知道



「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譯名，以為是動詞「Yench」的現在進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查不到這個字，因此他追問：到Harvard來「Yenching」究竟是做什麼事？這個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會後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兩位教授：一邊是柯利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先生，蒙古文和元史專家；他在北京（當時是「北平」）住過多年，說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邊則是Morton White（1917-2016）先生，剛剛接任哲學系主任。柯氏那時天天和洪業先生討論元史、蒙古史問題，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師」之後，我們之間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閡而進入了暢所欲言的境地。話題很快便轉到陳垣先生身上。我當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學問，但柯先生讀過了〈陳垣給胡適的一封信〉，十分憤怒，說他有學無德，是一個「投機分子」（opportunist）。我也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為他辯護。

我和懷特教授的交談對我後來在哈佛的治學方向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最初請教他哈佛哲學系的基本傾向，然後又問及最近哲學系有沒有中國研究生？在答覆後一問題時他告訴我二戰之後，有一位中國學生到哈佛來研究數理邏輯，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目前雖還是哈佛哲學系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在此一領域中已居於領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時已從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過當時他去了英國，我要等到很多年後才和他見面。最後我又問他教些什麼課程？他說除了分析哲學、美國思想外，近來正準備開一門新課，專講歷史哲學的問題。不過他補充一句，他不是要採用一套哲學玄思，強加在歷史整體之上，如黑格爾、馬克思、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或當代的湯恩比之所為。相反地，他是要運用最新發展的分析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來檢討歷史知識的性質和功用。我多年來都在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打交道，最近又為湯恩比的文明理論所吸引。因此一聽到懷特的話，不禁喜出望外，當即表示向他受教的誠意。此事後面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也是在這次大集會上，我第一次認識了來自台灣的兩位訪問學人——董同龢先生和邢慕寰先生。

董先生是一九五四年由台灣大學推薦而來的，一九五五年是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後一年。他曾戲稱自己是「二年級」，說我和邢慕寰是「一年級」。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以中國語言學，特別是音韻學為專業，走的是趙元任、李方桂兩大師的研究路線。他參加哈燕社訪問計畫時稍稍超過了四十歲，但已取得第一流的學術成就。他在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組主任是趙元任）潛修了十幾年，所著《上古音韻表》早已成為經典之作。他還寫了一部深入淺出的《中國語音史》，真正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他為人爽朗而謙和，對我這個「一年級」的小師弟頗多照顧。當年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Shepard Street, Cambridge），時相過從。一九六二年夏季，他受聘為印第安納大學教授，來美接洽移民



事，並順道重訪哈佛。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他重晤，特別請他午餐，長談了兩、三小時。但萬萬沒有料到，他回台灣後檢查身體，竟發現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便去世了。

### 「一見如故」的邢慕寰

其次再說我和邢慕寰先生（以下通稱「慕寰」）從相識到深交的經過。慕寰當時是台大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他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兩年曾由國家資源委員會保送來美進修，這是第二次來美。哈佛燕京社宴會後第二天，我們約好共進晚餐，彼此多一些瞭解。我們同屆，又同具中國背景，卻分別來自台灣和香港，所以交流和溝通是很有必要的。沒有想到，接談之下，彼此極感投契，幾乎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這是我生平極少有的經驗之一。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由許多特有的因素造成的，並非偶然。

第一、他是湖北黃梅人，與安徽潛山相去不遠，語音也相近，我小時在鄉間最愛聽的黃梅戲便是從他那裡傳過來的。我們之間多少有一種同鄉感。

第二、他的專業雖然是西方傳來的經濟學，但十六歲以前受的卻是私塾教育，認真學過古文、詩詞、書法，而且一生愛好詩詞，創作極多，足以傳世。（他死後，友人為他編了一部《邢慕寰院士詩詞選集》，二〇〇〇年由台北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作為一種非賣品發行）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他在飯桌上寫了一首七絕給我看，描述他第一次坐飛機的印象。我本來只記得最後一句，現在才在《選集》（頁一一）中查到了全詩，題作〈飛印途中〉，詩云：「淮南鷄犬無消息，但覺天階步步平。百萬峯巒爭入眼，回頭箇箇白雲生。」此中「天階」、「白雲」兩句確道出了初上天者的特有感受。這是他一九四五年赴美進修時寫的，十年之後尚可隨手拈來示人，可見是他極為得意之作。我在十六歲以前讀的也是私塾，最初寫詩也是私塾老師教的，可知我們的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見〈我走過的路〉，收在陳致《余英時訪談錄》，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頁一～一二）

第三、慕寰研究經濟學，最初傾向於計畫經濟。但他不取蘇聯的暴力專政，而接受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模式。一九四五至四六，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了一年的研究生，那是美國自由經濟學派的大本營。他深受海耶克（F.A. Hayek）的影響，終於領悟到在政治干預下的任何計畫經濟必然會導向「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一九四六年他有〈芝加哥就學〉七絕一首專記此悟：

昔日傾心服費邊，只緣時論太畸偏。一年默化門牆外，始悟楊朱洞燭先。（《選集》頁一四）

詩中借「楊朱為我」（即個人自由）表達歸宗於自由經濟之意。他的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我們在談話中曾涉及《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的作用，他雖不寫時



論，但他的同情顯然是在《自由中國》一邊。我最初曾有過一個疑慮：萬一他是一位封閉型的國民黨人或基本上認同於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則我將何以與之相處？但這餐飯吃下來，我的疑慮已煙消雲散了。

第四、作為一位專業學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德。限於篇幅，這裡只提三點：首先是他對真理的追求。他畢生研究經濟，特重理論，不斷深入，精益求精，完全體現了西方所謂「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其次，他並不僅僅為個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見經濟學在台灣的落後狀態，他不惜花費極大的功夫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經濟研究所，「他決定親自訓練，奠定初級研究人員的經濟理論基礎及分析經濟資料所用的工具。」（見于宗先為《詩詞選集》所寫〈序一〉，頁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劉子健先生適在台北，曾偶然旁聽過慕寰的課。他後來告訴我：慕寰指導學員讀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必使他們透澈理解而後已。劉先生說，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慕寰在此又繼承了「誨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傳統。最後，慕寰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前者包括編製國民所得及參與賦稅改革等等，後者則主要通過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當的實效。可見他仍然擁抱中國「士」的「學以致用」的基本價值。但他緊守經濟學家的專業立場，並不因為求「用」之故而踏進權與利的世界；他終生和仕途與商界無緣。對於他這些美德，我雖自知望塵莫及，然而確是「心嚮往之」的！

從上面的陳述，可見我們的價值系統大體相近，言談中處處融合無間，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還要加上一個因素，那便是我們的性情相投，即西方人所謂 chemistry 相合。所以我不認為我們的「一見如故」出於偶然。

第一學年我們分居兩處，但常常在劍橋一家中國館子吃飯。一九五六年春季我們便決定第二學年合住一處，可以自己做簡單的中國飯。慕寰說，他以前在美國曾有過自炊自食的經驗。因此六月底我們的租約滿期以後，在哈佛街（Harvard Street）找到了一所小公寓，開始了我們的同寓生活。此街離校園步行不過十幾分鐘，相當方便。但我於烹飪一道，完全外行，所以除了同去市場買食料以外，我們的分工如下：烹調重任由他獨力承當，清洗食具和整頓廚房、飯廳則全部由我負責。一年下來，這一分工證明是成功的。不過我必須補充一句，慕寰的烹飪功夫相當高明，不但日常菜餚隨手即成，必要時還能精製一二美味，接待賓客。我記得最清楚的便有兩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鴻經先生（曾任中央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這兩位貴賓都從頭到尾稱賞不已。

暑假三個月是我生平讀書最愉快也最有效的一段時期，至今記憶猶新。只要天氣晴朗，我們每天晚餐後必到查理斯河（Charles River）畔散步一小時左右，回來各歸己室，繼續





讀日間未畢之書，直到午夜。慕寰不斷探究經濟理論，我則趕讀一些西方、歷史和思想的名著。這是因為我下學年開始將做研究生，而自覺對西方文史哲之學所知淺薄，必須在開學前補充一些基礎知識。「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當然不是一天到晚都埋首書中，稍有倦意便到廚房去喝茶聊天，彼此的家世背景、生活經歷等都是在閒談中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同時在正經書外，我們也各有消閒的讀物。慕寰手頭有一冊美國作家史東（Irving Stone）的《梵谷傳》（*Lust for Life*），是關於荷蘭畫家梵谷（Van Gogh）的人生特寫，出之以小說方式，當時剛改編為電影，平裝本暢行。慕寰極賞其書，一面讀一面對我津津樂道（後來我也讀了）。我則一向喜歡偵探小說，一厚冊《福爾摩斯全集》便是在這個暑假中讀完的。

總之，這一暑假我們的生活完全自由自在，心境又非常平和，所以特別能感受到讀書的樂趣。

九月開課以後，我們都大忙特忙了起來。我因為選修了三門西方史學、哲學的課程，再加上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關於清史的「專題研究」（seminar），讀書和撰述的負擔都很重。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留待下文再詳。這裡只說我所見到的慕寰的研究取向。慕寰的主要興趣在經濟理論，並且常常跟我說，他有一套理論構想，只有在美國這樣人才濟濟的研究環境中才容易發展出來。所以他在哈佛訪問的最後一年必須抓緊時機，加倍努力。我不知道他選修了幾門課，但他在閒談中透露，這一學年他主要是跟兩位教授做研究：一位是哈佛的里昂狄夫（Wassily Leontief），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桑繆森（Paul Samuelson），不過性質不同。桑氏是數理經濟學的開創大師，慕寰每週去聽課兩次，主要是為了吸收新知。他參加里昂狄夫關於「美國經濟結構」（*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的專題研究才和他自己的理論研究密切聯繫了起來。他並不是旁聽此課，而是正式參加，既做口頭報告，也寫專題論文。里昂狄夫原籍俄國，最早在德國作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受中華民國鐵道部之聘，在南京做了一年的顧問，所以對中國學者很親切。慕寰和他過往極感愉快，研究也非常起勁。我記得他在做口頭報告前，草擬了一張很複雜的表格（table），但因時間關係，最後還是我幫他將定稿謄抄在一張極大的硬紙上面。里昂狄夫對他的論文顯然很欣賞，稍後將論文綱要發表在他主編的專刊上。

我們共寓的一年充滿著美好的回憶，中間沒有發生過任何一點不快或誤會。我相信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回台灣，重逢則在整整十年之後。但我們的緣分既深且遠，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慕寰寫詩贈我，先後多次。但我最珍愛的是他一九七五年贈我的五古一百字，用秀雅書法寫出。當時我全家從香港返美，所以慕寰賦詩贈別，把我們一家人個個都寫進去了。我回美後先後遷居三次，但無論在何處，這首詩都掛在客廳的牆上。現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以誌不忘：

世間何寂寞，知交君一人。披瀝見肝膽，契合若石金。久別縈夢寐，重晤感哀忱。康橋楓晚醉，裴山雪夜晴。旋有東林約，復聚南海濱。命隨蓬梗轉，分與芝蘭親。鴻案清芬溢，鳳丫秀色新。侵曉聽風雨，忘憂論古今。秣崗幽且嫺，秣川澹而溫。浩然欲歸去，長空涼月明。

英時兄與予相交二十年，離多會少，近二年竟重聚香江，輒過從長談。淑平嫂待予，亦如至友。今又遠別，書此留念。慕寰 乙卯

### 「訪問」一年的工作回顧

最後，我要回顧一下這一年作為「訪問學人」，我做了些什麼事。由於上述遲到的緣故，我一直到十月底才覓得住處，在劍橋的生活勉強算是安頓了下來。因此整個上學期，我僅僅旁聽了幾個課，都是從半途開始的；除了聽課能力稍有進步外，談不上有什麼心得。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全心全意追求新知，是我必須完成一篇新亞研究所的專題論文。

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我開始撰寫〈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論文，即是對研究所的工作報告。但當時僅成半篇，行前來不及終卷。錢先生囑我到美後續成，以便刊入《新亞學報》第二期。該期已決定於一九五六年二月截稿，錢先生希望我的論文可以及時刊出，作為新亞研究所的一種成績，也算對哈燕社支援研究所的一種回報。所以我在生活安定後，便利用哈佛的豐富藏書，重寫此文。全稿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完成，共五萬餘言，改題為〈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但這篇文稿竟導致我初次向楊師蓮生（聯陞）問學的機緣，並由此而開始接觸了日本和西方的漢學，則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 向楊聯陞先生問學

在兩三個月的重寫過程中，平時來往較多的朋友們都已知道我的研究題旨。其中劉子健先生和張鏡湖先生曾先後對我說：楊先生早年在清華時已發表過一篇和我的題旨相近的名文，因此叮嚀我必須向他請教。劉對楊先生一向敬佩，時時請益。張是氣象學家，其時在哈佛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和楊先生同嗜圍棋與麻將牌，交往很密，又由於他是張曉峰（其昀）先生的公子，對於楊先生的史學成就也有親切的聞見。他們既如此說，我已決定在完稿後請楊先生閱評。前面已說過，我在來美前從無機會得聞楊先生的大名。大約在上述哈燕社宴會後不久，我和董同龢先生和慕寰共同晚餐，餐後董先生提議我們同去拜訪楊先生。他們是清華同學，相知頗深，所以不必事先約會，也不必打電話詢問。這是我第一次



和蓮生師會面（十月中哈燕社會宴，他大概有它事未來）。我們在楊家飯廳中暢談了兩三小時，歷史、語言、文學、社會科學等無不涉及，楊先生不但議論風生而且處處流露出知識範圍之廣闊和識見之深厚。我還記得在談到當今詩詞作家時，他特別推崇蕭公權先生，並檢出蕭的手稿相示。他說，清華教授中以詩詞的創作才能而言，前有王國維，後有蕭公權，他譽之為「王蕭繼美」。當晚回到住處，我立即寫信給錢先生，報告會後情況並表示對楊先生的欽佩之意。我問錢先生，是不是認識他？錢先生回信說：「楊君治經濟史有年，弟能常與接觸，定可有益。」（此信《素書樓餘瀋·書札》未收，原件當仍在素書樓中）以此因緣，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能審核我的文稿。

文成後的第二天下午，楊先生便約我在他的辦公室相會。他先借出載有他的〈東漢的豪族〉的《清華學報》，並笑著對我說：「讓我們先讀彼此的文章。」他讀得極快，並隨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誤字以及行文欠妥之處，但最後告訴我，我的論文重點和他不同，其中並無多少重複之處，可以另行發表。我多日來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來。接著他又介紹了兩部近著，供我參考：一是瑞典學者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的 *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漢代的中興》，一九五三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宮清吉的《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當即攜歸細讀，於是才認識到他國學人研究中國學問已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無知而對國外漢學所抱的些許偏見，至此已一掃而光。但楊先生一貫的批評精神也對我發生了影響。他認為畢漢思書中一個重要觀點，即王莽政權亡於黃河改道，立論太偏，且無強證，與我的論文主旨也有衝突，因此特別要我加以討論。我的論文「後記」以〈畢漢思「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說」質疑〉為題，即因他的指示而來。但當時不便明言，以免為他招怨。自此以後，我一方面不斷注意歐、美漢學家的論著，另一方面則對其中某些新奇可異之說絕不肯輕易放過。楊先生對於西方漢學的態度在蕭公權先生下面一段記述中表達得最清楚：

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起來的「假說」，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於想像力（imaginative）。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天際的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六四）

楊先生後來對我說，「天上浮雲」的引言借自傅斯年先生；傅用此語則是譏刺拉提摩爾



(Owen Lattimore) 關於中國邊疆史的信口開河。蕭先生晚年在美國執教，對於「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深同此感。所以他也引王陽明的名言與楊先生的話相印證，其言曰：

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同上，頁二二三。按：頁二二四譯楊語為「把天際浮雲誤認為地平線上的叢樹。」似更精確。)

楊、蕭二公說的雖是五十年前的話，但今天並未過時，甚至更為適用。因為今天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或東南亞的華人子弟，由於古典語文的訓練遠非昔比，已越來越不能判斷這一類「學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們不但不能以批評的眼光閱讀，而且往往一擁而上，為之推波助瀾。我之所以鄭重引楊、蕭二公的話，只是希望或許能發生一點警惕作用，即使完全無效，至少也盡了一己的良知。(關於楊先生的系統介紹，可看我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收在《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

### 旁聽三門課

我訪問的上學期主要用在這篇論文上面，下學期（二月至六月）我才能全心全意地聽課並閱讀指定的教材。這學期一共旁聽了三門課程，即帕森斯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屬社會關係學系)、布林頓 (Crane Brinton) 的「歐洲近代思想史」和基爾莫 (Myron P. Gilmore, 1910-1978) 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讓我稍稍解釋一下選聽此三門課程的背景。

### 帕森斯的「社會系統」

前面已提到，我在香港期間已通過陳伯莊先生和他的《現代學術季刊》，對帕森斯及其《社會系統》一書稍有認識，到哈佛以後更發現帕氏和他的新理論在美國社會科學界如日中天，其影響力之大遠遠超過社會領域之外。我既來哈佛，恰巧他正在講授這門課，則聽他親口講述，以明究竟，自然成為一個無法壓抑的欲望。帕氏講述的內容不斷在修正和發展之中，與寫成的文本互相照應、互相補足，但並不重複，也很少鑿柄。在課堂上，他並不只講理論，而是引不同社會生活方式所呈現的「事實」與「理論」互相「證實」。(「Verification」或「verify」是他常用的字) 他也分析了中國社會系統，參考書則包括了費孝通的 *Earthbound China* (《鄉土中國》)，我才知道費後來在《觀察叢書》中刊布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最初是用英文寫成的。

我在聽課過程中，終於掌握到帕森斯理論的思想來源。一方面，我閱覽了不少當時學人



對他的評介文字，另一方面，我很費勁地讀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成名專著——《社會行動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在這一部八百頁的鉅著中，他把他自己所全力推動的「行動的理論」（*The Theory of Action*）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一群社會科學家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有英國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義大利的帕勒托（*Vilfredo Pareto*）、法國的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和德國的韋伯（*Max Weber*）。但帕森斯對韋伯尤其推重，他可以說是韋伯在美國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無論如何，韋伯學術之所以能傳入美國而成為一派顯學，帕氏的功績無人可及。最顯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便是帕氏在一九三〇年譯成英文而流傳天下。

就我聽此課的效果而言，我對於他所建構的現代社會的理論，興趣逐漸轉淡，但是通過講論而接觸到韋伯有關歷史社會的多方面觀察卻越來越感到引人入勝，特別是韋伯對於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比較和分析。關於這一方面，以後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關於帕森斯及其理論，這裡還要補充一筆。一九五〇年代中葉是他的鼎盛時期，但進入六〇年代以後，由於美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他的理論已開始受到質疑與批評。特別是因反越戰而馬克思派的激進思潮湧現以後，他以美國經驗為背景而建構起來的所謂「現代型社會模式」，在新一代社會學家和青年學生眼中已成為「落後」甚至「反動」的代表。據近來偶然讀到有關論評，似乎帕氏理論在他死後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積極評價，但五〇年代的光輝則已一去不復返了。新理論、新觀點的興起和衰落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幾乎每隔五、七年便有一批，不足為奇。但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帕森斯是我遇到的最早一例，所以印象最深。

我和帕森斯並無個人間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記下來，以博讀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從哈佛請假回到新亞，負責行政事務，以落實當年回母校服務兩年的承諾。不記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日本講學，順道來香港一遊，新亞社會學系同仁（當時金耀基兄在內）請他來做一次講演。他聽說新亞校長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願意一見。此事突如其來，我是在十分詫異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們的短暫交談當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香港社會學界特別請他來香港的？他說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日本臨時請旅行社代他安排訪港的，到了以後才通知了一兩位相識的同行。我又補問一句：你下飛機後有熟人迎接嗎？他笑著說，只有兩家服裝店代表歡迎我，要為我特製西服。我聽了也不禁大笑。

##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我選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為讀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一部名書：《觀



念與人》(Idea and Men)，此書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是那個時期一部暢銷書。在這部書中，他特別提出社會上層有系統的「正式思想」(formal thought，如西方的「哲學」或中國的「經學」、「子學」，與流行在社會下層的「民間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區別和關係。他指出，向來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範圍之內，「民間思想」則未受到同樣的重視，也許因為後者寓於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時甚至和人的行動難以截然分開。但他強調：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務是把從抽象哲學概念到人的具體行動集合起來，使之構成一「可以理解的整體」(as intelligible whole)。因此就工作的性質而言，他在一端是處理玄思的哲學史家，而在另一端則是一個社會史家，要從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輪廓。但他的特殊任務則是將這兩端連結起來。(此段見 *Idea and Men*, New York, 1950, p.9) 如果借用王陽明的名詞，可以說這是一種「知行合一」的思想史。我對布氏的觀察很感興趣，因為中國傳統時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中的說法：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與「春秋」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

這明明是說：六經起源於「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動，並非聖人憑空創獲的。劉氏在此實已把布林頓所謂「兩端」連成了一體。不但劉氏如此，後來章學誠斷言「道」必求之於「人倫日用」，以及「學於眾人，斯為聖人」(見《文史通義·原道三篇》)，則更做了進一層的發揮。甚至戴震也強調：在人的世界中，「人倫日用，凡生所有事……是謂道。」(見戴震〈緒言〉)由此可知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必須打通這一構想，在中國學術傳統中早已建立起來了。這是我選聽布林頓思想史一課的主要動機。

布林頓是歷史系的資深名教授，以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為世所重，著作甚多，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3)已成經典之作。他在全校也是最受尊重的學者之一，所以被選為哈佛「院士會」(Society of Fellows)，第二任主席(chairman)，從五〇年代一直做到一九六六年退休。「院士會」是哈佛最高的學術團體，這是人盡皆知的。

因此之故，布氏歐洲思想史一課的號召力很大，學生極為擁擠。但是我聽他的課很感不易，因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講課並非綱舉目張，條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經意地隨口而出，又隨時從一個論題跳到另一個論題。我當時以為他年事已高，精



力不夠所致，但後來讀到他三〇年代學生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講課以極其隨便著稱。（exasperatingly casual lectures，見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 Boston and New York, 2000, p.172）但他確是言之有物，學生一路聽下來，各有所得。不過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評介當時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徑及其優點和缺點的所在。我之所以獲讀拉夫覺埃（Arthur O. Lovejoy）的名著《存有的鉅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Harvard, 1936），並進一步對「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方法有所認識，便得自布林頓的講課。後來寫博士論文時，我才體會到當時旁聽布氏的講論對我研究中國思想史無形中發生了不少啟示作用。

###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最後讓我說明為什麼旁聽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我到哈佛以前，從來不知道有基爾莫其人。我聽此課主要是實踐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訪問計畫。我在計畫中說，有機會到哈佛訪問一年或兩年，我希望能多讀一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著述，使我可以認識歐洲是怎樣從中古演變成近代的。我相信，這一方面的歷史知識將大有助於我將來研究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轉移到現代的整體歷程。到哈佛以後，我查出基爾莫是這一領域的專家，恰巧他這一年又開了講演課程，其對象是三、四年級大學本科生和一、二年級研究生，所以我決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還有一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聽此課。我所聽其他各課都只有我一個中國人，而文藝復興一課卻有另一位中國學生正式選修，而且必須參加考試以取得學分。這位中國學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三〇年代末畢業於北京大學。到台灣以後，他在師範學院（後改為「大學」）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職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費留美，獲得兩年獎學金，到哈佛來攻讀歷史碩士學位。由於他專攻歐洲史，又是學長，我感到機會難得，可以隨時向他求教，他也很高興，有我為伴，互相溝通。我清楚記得他說，據他查考的結果，基爾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寫過一本關於文藝復興的專著，又同在大學擔任文藝復興史教授，頗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我和王先生的緣分尚不止此。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從哈佛告假回到新亞書院，他恰好已從台北轉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系任高級講師，不過不再教西洋史，而改授中國近代史，因此我們在香港中大又有過兩年同事的機緣。他在中大時期寫成了《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一九八二年香港中大出版社），是一部很詳實的專著。可惜他去世較早，專著出版他已不及見了。

關於基爾莫，下面將作介紹，這裡暫且從略。



## 二、攻讀博士學位

前面已說過，新亞推薦我來哈佛，是為了參加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的計畫，為期不超過兩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過攻讀學位的念頭。然而一年之後，即從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從訪問計畫轉為正式研究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對此先作一交代。

大約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成立了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名之曰「中國流亡知識人援助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其功能在通過種種方式幫助從大陸逃出的知識界人士重獲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國家在內。我父親很早便向援助會登記，申請移居美國，但因久無回應，已將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湊巧，我到美國不久，父親竟收到援助會通知，申請已獲通過；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在美親友或機構的書面保證，在生活困難時願意提供經濟支援。由於這一非常意外的變化，父親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兩年之內回香港，剛好和全家來美錯開了，因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寫快信給我，讓我向哈佛探詢，是否可以轉入博士研究計畫，以延長留美期限，他並且告訴我：他已取得賓四師的首肯。

當時我一方面為父親高興，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啟齒。一再考慮之後，我決定先向楊聯陞教授請示，看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出乎意料之外，楊先生對我讀博士學位相當熱心。他告訴我：最初在訪問學人的審查會上，大家對我唯一遲疑的地方是年齡太輕——訪問學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而我當時才二十五歲。因此他鼓勵我向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直接提出轉換研究計畫的請求。不但如此，他還教我怎樣陳辭，以獲得葉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實上，主要關鍵是楊先生有意收我為他的博士生，否則絕不可能如此順利。不過我當時對於哈佛大學研究院的運作程序茫無所知，直到多年後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這一點。

從訪問學人一變而成博士研究生，這是我個人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很顯然地，如果我訪問兩年後即回新亞，則此下教學和研究必將走上另一條道路。當時錢先生由於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許我改修學位，但是他內心則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亞。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上說得非常坦率：

弟儻能早返，得失之間，亦殊難計量。國內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積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模，不負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舊籍邃深，亦甚須潛心，時過而學，則事倍功半。至於他年重謀出國，機緣決不乏，故弟之繼續在國外深造，或先歸益治舊籍，再過數年，重再遠遊，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儘可安心乘運，不必多所計慮也。





(《素書樓餘瀋》，全集本，頁四〇三～四〇四)

錢先生在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願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將畢生治學心得傳授給我。這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話，當時讀後我內心甚為激動。親承錢先生的衣鉢可以說是人生最難得的際遇，豈能和在美讀學位相提並論？必須指出：這不僅關繫著治學途徑的抉擇，而且更涉及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錢先生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上，特別對這一點作了十分動人的描述。他說：

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乘此擺開，多得清閒，有英時等數人時時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當自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遊，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脫轡絕馳，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同上，頁二〇六～二〇七)

這是錢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魯大學訪問前所寫的信，所以有「明年遠遊」的話。三年前他要我「早歸」，「相與講究切磋」，這一想法此時竟以純感性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我終於不得不改讀學位，並且畢業後也不得不先在美國執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亞，履行了當年承諾的義務，但那時錢先生卻已定居在台北了。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系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現在讓我對讀學位的曲折過程作一簡要追憶。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為哈佛歷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據那時系中規定，博士生必須選修四門專科：一門主修科 (major field) 和三門副修科 (minor fields)。我的主科是追隨楊先生研究中國古史 (集中在漢、唐之間)，這是早已決定了的。副科三門之中，我首先選了中國近代史，由費正清和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兩人合授。就我當時聞見所及，西方學者研究這一領域大體以西方檔案和記載為主要史料，如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1953) 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一取徑恰好可以糾正中國學者的研究偏向。我覺得不應放過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大好機會。另外兩門副科我在原則上已決定選取歐洲史方面。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考慮到將來回到新亞的教學要求，不過當時心中除了「文藝復興」一科之外，另一科則在猶豫之中。好在選科的確定為時尚早，我仍可從容思考。

我第一學年選修的課程充分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態。



## 賽門的「羅馬史」

首先我選修了一門羅馬史。這是因為基爾莫本年休假，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這一段歷史沒有任何課程可選。哈佛本來也沒有羅馬史的專任教授，恰巧英國牛津大學的賽門（Ronald Syme, 1903-1989）來哈佛任訪問教授一年，開了這門課。我當時對西方史學界所知有限，根本未聞其名，但在歷史系的選課聚會上，費正清教授特別向我推薦，說他是當代羅馬史大家，機會難得。我考慮到羅馬適可與漢代中國互相對照，以凸顯東西兩大統一帝國之異同所在，當下便接受了費正清的提議。後來我讀了他的名著《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及其他論文，再加上聽了一學期的講授，對他的淵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誠不愧為一代史學大師。三十多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布朗（Peter Brown）教授偶有交流的機會。我有一次問他在牛津時曾否從學於賽門？他很興奮地說：他聽過賽氏講課，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他的專業導師另有其人。（按：其人即 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也是同領域的大師。布朗是當今最受尊重的羅馬史家，開闢了所謂「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的研究園地。他獲得的學術榮譽無數，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後來我寫《漢代貿易與擴張》，涉及中國與羅馬的交通，頗得力於賽氏此課，但這是意外的幸運，非始料所及。



## 懷特的「歷史哲學」

其次，我選了哲學系懷特教授的歷史哲學，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學社的宴會上，我已開始對他的歷史哲學感到極大的興趣，現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分，便決定正式選修此課「史學的性質與功能」（Nature and Function of History）。

事實上，這是懷特經過多年醞釀而開出的新課，選課的學生（包括高年級大學生和研究生）多來自歷史系，哲學系學生反而是少數。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懷特和英國哲學家（俄裔）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志同道合，一直在計畫合寫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書；這一點在兩人通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必須記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學（包括語言哲學）的壯盛時代，從分析與語言角度討論史學的性質問題也乘勢興起，柏林和懷特都是這一新潮的先驅者。一九五三年柏林關於「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著名演講（後來以專書問世），即曾轟傳一時。懷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與柏林大體相近，他也受到後者的啟發，所以合作寫書的動機很強。懷特在哈佛開這門新課便是為了完成這一願望。但稍後他發現：和柏林之間還存著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調和，終於獨立出版了《歷史知識的基礎》（*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1965）那本富有原創性的專著。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懷特的自傳——《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1-232; P244-247.）



由於懷特自覺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人文園地，他在講堂上時時流露出一種推動新潮流的激情。這激情對不少聽講者發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參預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這大概相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預流」。其影響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對中西史學之間的異同作較深入的考察，以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懷特課上，我提出以章學誠與柯靈烏（R.G. Collingwood）史學思想的比較，作為期中論文的題旨。恰巧一九五三年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1923-2014）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章學誠的文史思想》。（*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關於倪氏在哈佛研究章學誠及其與分析哲學的交涉，參看我為他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中譯本所寫的〈序〉，收在我的《會友集》上冊，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年，頁一六八～一七六）懷特知有此英文論文可資參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便是由這篇期中論文擴大與修訂而成。（現收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

懷特此課對我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學誠與戴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便是從這裡開端的。不僅此也，即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和懷特教授也頗為有緣。我一九八七年移講普林斯頓大學，發現他已在一九七〇年從哈佛轉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和他聚餐和談論。我們聚談常有普大漢學友人如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爾曼（Benjamin Elman）等參加，甚為歡暢。記得懷特有一次笑著對我們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卻想不到由於我聽過他的課，竟結交了許多漢學家朋友，而且對於中國文化和思想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懷特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以中國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現代美國哲學史上，他的成就無論就哲學的分析或實驗主義的推陳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實過於名，誠如羅特（Richard Rorty, 1931-2007）所感慨的，是由於受到哲學界的忽視。這是有欠公平的。（見Herman J. Saathamp, Jr., edited, *Rorty&Pragmatism: The Philosopher Responds to His Crit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pp. 214-215.）

###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選的第三門課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學系名家佛烈德里治（Carl J. Friedrich, 1901-1984）講授。佛氏原籍德國，對政治哲學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勝舉。當時他對極權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差異，分辨得最為到家，影響極大。我之所以選此課，主要是因為我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探討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並寫了一些相關的文字。但那時我深感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統性的認識，因為沒有受過嚴格訓練，而新亞書院也未設政治學系。當時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先父指點之外，別無可以請教的



人，現在竟有佛氏這樣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選擇，自然不肯放過天賜良機。佛氏此課包括講授、討論班、讀原始經典、寫期中論文等等，正合乎我培養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週一次的討論班中不但要求學生將他的講詞和經典文本結合起來討論，而且鼓勵外國學生將西方的政治觀念和他們自己本土的思想試作比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國、中東等地的留學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對中國儒家、道家略作介紹。此課對我當然是一種很有益的訓練，但我也同時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識遠遠不足。我既不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經典常識等方面和美國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從頭到尾，我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過我在此課中也得到一個有趣的經驗，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學生寫一篇期中論文，以代替期中考試，但說明這只是擇一題旨陳述己見的報告，並非研究性論文，因此不必詳引經典文本並加腳註。我當時正在讀柏拉圖（Plato, 427-347 B.C.E.）的《共和國》（*Republic*），發生了一個疑問：這一關於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圖獨自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前有所承，早已潛存在希臘傳統之中呢？我查了幾種有關《共和國》的流行論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過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國考證學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臘相關經典文本中試加追尋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國》以外，我又遍檢了柏拉圖的《政治家》（*Statesman*）和《法律》（*Laws*）以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的《政治學》（*Politics*）和《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並且參考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C.400 B.C.E.）的史著《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戰爭》（*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最後我寫成了一篇五、六頁的短文，報告探索所得，發現《共和國》的構想確有源頭可尋。由於佛氏交代學生不必註釋，我在文中僅引述經典文本，未詳列篇章與頁數。想不到一星期之後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親筆短信，要我將論文中所引經典文本，一一註明篇章，供他參考。這實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興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證有可取之處，對於他這樣的專家尚不無參考價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記憶仍大致清楚，可見當時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書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遷中遺失無踪了。

###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上述三門課和我的學位計畫完全不相干。我的選擇大致基於兩重考慮：第一是當時決定讀完學位便回新亞任教，因此覺得應該把握住現有的機會，對西方歷史與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認識，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選課程和我在香港幾年來研讀與寫作的領域比較接近，因此興趣相當濃厚。但是這三門課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時攻讀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為薄弱，其中任何一門都讓我感到吃力，何況同時修三門？同時我又拘泥於歷史系所頒發的修課指南，說博士生每學期可選三門演講課，另加一門「專題研究課」，寫出一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研討課（seminar）我當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領域，所以



選了費正清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此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約六至七人）共同研讀《籌辦夷務始末》中若干特選的篇章，並儘量參考相關的西方文獻。但這一部分僅限於最初三至四星期，作為全課的預備階段；研究生則在此期間選定論文題目，開始進行個別的研究。第二部分接著第一階段而來，由研究生每週輪流報告研究所得，然後再經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質詢和討論。這是我第一次進入西方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行列，因此特別在此記下一筆。（按：當時美國學術界一般以「漢學Sinology」指有關「近代以前中國pre-modern China」的學問；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下則通稱「中國研究」。）

我在這門課上的研究論文是通過晚清經世思想的脈絡對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的《校邠廬抗議》和《顯志堂稿》作了較深入的分析和觀察。當時此課的助教是劉廣京（一九二一～二〇〇六）先生，精治中國近代史和美國經濟史，最為費氏所倚重。他和費氏互相商討之後，對論文的內涵一致認可。但費氏在文末卻另寫了一句評語，使我頗為窘迫。他的原文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你的漢字羅馬拼音完全錯了。）原來當時西方對於漢字譯音一律採用Wade-Giles系統，而我則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以致文中漢名我都根據自己的讀音（不正確也不統一）隨意拼出，終成一大笑話。後來得到劉廣京先生的指點我才開始從漢英大辭典中學習拼音系統。我於「中國研究」或「漢學」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由此可見。

從上面的記述，第一學期可以說是我最為緊張的一段時間。這主要是由於我將歷史系的指南做了百分之百的字面理解，而沒有事先多向有經驗的學長請教，甚至也沒問問指導教授。事實上，研究生第一學年不修「研討課」是很平常的事，而三門講演課中也可以用不需考試的「閱讀課」（reading course）取代其一；如此始可得從容不迫的樂趣。

## 「日文專修」

但是我的博士計畫在第二學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做了一次基本調整，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用日文專修代替了一門歐洲史。所以最後定案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和日本語文。這一計畫同時獲得歷史系和遠東語文系的接受；以下兩三年我的研讀和寫作便集中在這一範圍之內。

我之所以有此變動，主要是受了楊先生的影響。第一年下學期我選修了他的「中國制度史」一課；這是他教學和研究重點所在，所以他的第一部論文集便是《中國制度史研究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1961）。他講授此課，用自編《中國史綱領》（*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 1950）為教本，其中不但包括了分門別類的題旨，而且在每一門類中都列舉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和現代論著。原始史料是我素所熟悉的，但現代論著卻是我的空白點，前面回憶向楊先生請教關於東漢士族一文時，已經提到。現在



正式修課，我才有系統而且較全面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漢學成績。楊先生在《綱領》中當然無法多舉漢學論著，但在講論時則擇其佳者加以評介，並特別重視最新的創獲。一學期下來，我發現日本關於中國史各方面的研究不僅深入而且數量之多遠出想像之外。我感到日文閱讀或許是我的專業所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為此我曾特意請示楊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他說：我最好少修一門歐洲史，代之以日文，因為遠東語文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的日文是一門所謂「高強度課」（「intensive course」），由系主任賴世和（Edwin O. Reischauer，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任美國駐日大使）親授，每星期五堂，非全力以赴不可。我改學日文的事便這樣決定了下來。當年（一九五七）嚴耕望先生恰好是哈燕社的訪問學人，他遍檢漢和圖書館藏書之後，發現其中有無數日文書刊是研究唐史所必須參閱的。他聽我說遠東系設有日文課程，便毫不遲疑地和我一齊選讀了賴世和的課，不過他不需考試，比我輕鬆多了。

大約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作為博士研究生所選修的課程，包括「講演課」（lecture courses）和「研討課」，已滿足了學校的要求。緊接著而來的便是和三門專科的導師分別商討，怎樣準備博士口試，這是整個博士計畫的最大關口。這一準備基本上是通過「閱讀課」方式與導師定時溝通，每週或每兩週聚會一次。研究生從聚會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問題重心和閱讀範圍。

我的三位導師是楊先生、費正清和基爾莫。不巧的是楊先生——我的主修科導師——適在一九五八年尾發生了嚴重的精神焦慮症，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治療和休養，所以「閱讀課」只能從兩門副修科開始。中國近代史一科進行得很順利，可以不談，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是我基礎最薄弱的一科，這裡應該略作記述。

###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讓我先從導師基爾莫說起。他是美國中年一輩中最傑出的歐洲早期近代（early modern）史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他應哈佛近代史權威蘭格（William L. Langer）之邀，為著名的《近代歐洲的興起》（*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叢書系列寫了一部《人文主義的世界》（*The World of Humanism, 1453-1517*），其實便是文藝復興最重要階段的歷史。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是因為他早已發表了不少專題論文，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前面提到，我在第一年訪問哈佛時，已和王德昭先生聽過他的講演課。但是我當時只是旁聽，並未讀畢指定參考書，所得不過是一個大概而已。等我第二年轉為博士生以後，他先是休假，接著又擔任了歷史系系主任之職（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沒有再開過上述的講演課了。但我在第三學年也修過一門文藝復興史的講演課，主講人是訪問教授紀伯特（Felix Gilbert, 1905-1991）。紀氏原籍義大利，四十年代移民美國，當時在賓州布林



學院 (Bryn Mawr College) 任教。但他不僅是最有貢獻的文藝復興專家之一，而且也被公認為具有通識的史學大家。(所以一九六二年他被聘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常任歷史教授。) 我聽到歷史系研究生對他的介紹後，便決定選修此課。紀氏的講論和指定讀物確實引起了我的深厚興趣，因此一九五九年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之約，我寫了〈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篇長文，其中便引用了紀氏的一些學報論文。(此文後稍加訂正，收入《歷史與思想》中。) 這是我修紀氏一課所留下的一點紀念。我到普林斯頓之後，他早已在一九七五年退休，且年過八旬，我沒有機緣和他重晤，不過我還是讀到了他的一部晚年著作 (*History: 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 1990)，頗為得益。

從以上的記述可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科的「閱讀課」之前，我和基爾莫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交往。我聽過他的課，也讀過他的《人文主義的世界》，對他當然不陌生，但他對我則一無所知。他接受我為研究生（即允許我參加他的「閱讀課」），主要是因為我已修過紀柏特的課，而且僅僅作為副修科之一。所以他雖明知我的背景知識有限，仍從寬處理。但那時他的系務甚忙，研究生又有八、九人之多，因此每二週聚會二小時左右，討論各人「閱讀」中出現的問題。他本人不作長篇大論，往往只就討論中的難題，稍加評斷。我仍然沒有多少機會和他直接溝通。一學期中我和他單獨談話不超過兩次，每次不過二十分鐘，主要是報告我的「閱讀」情況，並聽取他的指示。所以在我預備博士口試的期間，對於基爾莫這一科最沒有把握。但是在準備過程中，我確實得到了學問上的進益，雖然與考試並無直接關係。至今我還記得兩件事：第一、一九五八年心理學家艾理克遜 (Erik H. Erikson, 1902-1994) 出版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青年時代的專著，從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對於宗教改革的起源提出了極為新穎的觀察。(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1958)。我便是在「閱讀」班上從其他研究生的討論中得知此書及其在史學上的原創性，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很有啟發作用。第二、基爾莫研究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 (Erasmus, 1466-1536) 極為深入，是公認的權威學人。他有一篇名文，探討伊氏如何通過「博學」(eruditio) 以重建基督教的「信仰」(fides)，我讀後大為激動，因為這和清代學者有關「訓詁」與「義理」的論辯如出一轍，為我打開了中、西思想史互相比觀的大門。(見 Myron P. Gilmore, "Fides et Eruditio, Erasmu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後來收在他的 *Humanists and Jurists, Six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87-114)。

總之，對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門副修科，我當年確實很認真地學習過，而且也受益不少，但我在博士口試中卻表現得不盡人意。我平時最用心準備的領域，基爾莫完全沒有觸及，而他提出的有些具體問題我只能說個大概，無法盡其底蘊。口試雖然通過了，我卻不免有一點失落感。



## 博士論文

最後，讓我簡單交代一下我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A.D. 25-220*）。一九五九年我為錢先生祝壽而撰寫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文長十萬言。與以前論東漢士族一文不同，我收集並參考了無數相關的現代論著，包括中、日、英、法各國作者在內。初稿寫成後，我曾請楊先生審閱一遍，有所指正。他大體上很贊成我的論旨，並同意我將來以此文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按：楊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也有「此文一部分又作論文」的記載。所謂「論文」即指博士論文而言。）但後來正式構思論文時，我的想法改變了。首先是我覺得用英文重新建構已刊的中文專論，缺少新鮮感和思想上的刺激；我寧願多費些功夫，另起爐灶。其次，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因受到布林頓等人討論「正式思想」（formal thought）與「民間思想」（popular thought）的影響，很想從這一角度作一次新嘗試。所謂「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臘哲學家和中國先秦諸子）發展出來的系統性學術或理論；所謂「民間思想」則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意識。研究「民間思想」的最大困難在於史料缺乏而且散在各處。恰好一九六〇年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出版了，其中包涵了不少東漢晚期的民間思想。（斷代問題已有專家多人考證了出來）。而且在這一段時期，大陸和日本學者也發表了不少有關《太平經》的研究論文。因此我想以《太平經》為線索，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建構出東漢「民間思想」的輪廓，再進而探究它和當時「正式思想」的交涉。我的原始構想是選出一些文化精英和一般人民都關注的共同觀念，然後在傳世經典和民間記載兩大類的文獻中詳加搜尋，以期發現其間的互動與異同。「生」與「死」顯然便屬於這一類的共同觀念。我最初提出「生」與「死」只是作為第一章的論題，接下去還有別的共同觀念，可以繼續分章析論。我把這一新構想向楊先生陳述之後，他承認這不失為一個推陳出新的設計，但要我先將第一章寫出來，作為一種嘗試，如果不成功則別作計較。不料這「生」與「死」的一對觀念竟複雜萬分，牽涉方面之廣完全出於意想之外。寫到一半左右，楊先生檢閱了初稿，叫我即以第一章擴大為論文整體，不必再延伸至其他觀念。這樣一來，《東漢生死觀》便正式成為我的博士論文了。我作此說明是為了澄清一個誤解，認為我的論文是關於《太平經》的研究。

我的論文導師是楊先生，但此外還有兩位審讀人，即費正清和史華慈教授，楊先生對論文的內內外外都很清楚，自不在話下。費、史兩位教授通讀一遍，也無異辭。一九六二年一月初，他們三人開審查會之後，費正清以博士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宣稱論文不需作任何重大修改，於是我的學位計畫便完成了。

但是這裡我還要特別一提史華慈先生對論文的關切。他在論文通過以後，給我寫了兩頁的評語，指出其中的確有可商榷的地方，也有可稱賞的地方。可商榷的主要是我將中國概





念轉化為西方名詞時，涵義往往不甚妥貼，易起誤解，如中文的「出世」與「入世」和西方的「otherworldly」與「worldly」之類。這些可商之處後來我在重寫為學報論文的過程中都一一改正了。他稱賞的是文中關於「形」與「神」、「魂」與「魄」等觀念的深入討論，顯示出中國在佛教未傳入之前早已有身體和靈魂二分的思想。他說我的論據已「斷然證明李約瑟（的看法）是錯誤的。」（It conclusively proves Needham wrong.....）史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甚多，但他真正的興趣與貢獻卻在中國思想史，晚年所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85）可證。所以他對我的論文閱讀一遍，便能很快抓住其得失所在。（有趣的是：李約瑟在討論我一九六四年發表的 *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 一文時卻堅持他的舊說，認為中國本土思想中只有「此世」（this world）而無「彼世」（otherworld），當然也不可能有靈魂與身體的二分。見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5, book 2, p.98, note C, 1974。關於這一問題，後來我又寫了〈魂兮歸來！〉一文，詳論佛教傳來以前中國人關於死後世界的認識及其變遷。見〈*O Soul Come Back! —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 Buddhist China.*〉。以上兩篇文章現已收在 Ying-Shih Yü,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vol. 1）。

（待續）

### 余英時

一九三〇年天津出生，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二〇〇六年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二〇一四年獲頒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主要著作有《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東漢生死觀》等等，中、英書籍近六〇冊，論文四〇〇餘篇。運用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學界公認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



【師承與私淑】

# 從費景漢院士到余英時院士

## ——我的幸運長輩緣

日內瓦·朱敬一·文·照片提供

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的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歲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想找機會與這兩位泰斗級的人多親近。我問費老，張光直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貢獻各是什麼呢？費老就侃侃而談，把張先生在殷周考古學、中國青銅器考古發現多在禮器等特殊的意義解說了一番。然後講到余英時先生，就沒有那麼言簡意賅了。費老補充：他每次跟余先生談話（他們在Yale有同事重疊幾年），他都覺得極有收穫，好像有撈不完的寶藏，「你有機會應該多和余先生聊聊」。

余先生的腦子埋了多少寶藏呢？舉幾個例子可能比較清楚生動。一九九八年我當選中央

研究院院士之後，有幾回在某個院士被提名人的討論中，余先生都很客氣、謙虛地呈現了他的驚人記憶。何炳棣先生是第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年齡比余先生還要大上一輪多，是人文組最資深的歷史學長老。有一次，為了一件院士提名案，何先生對被提名人的宋明理學見解提出了一些評論。由於余先生看法不同，於是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余老不厭其煩，從宋代某甲給某乙在某年所寫的某信，講到某丙某丁在其後哪一本著作如何與之呼應……，對何先生一批駁陳述。這些都是現場偶發之回應，絕對不是先前準備好的講稿。余先生對各筆史料如數家珍，說完最後致歉「擔誤大家時間，掉了一些書袋」做結尾，現場一片安靜，而年長的何院士也不再置一詞，討論結束。

那一次交鋒之後，大概誰是人文組院士的「精神領袖」就不證自明，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然而余老從來不以領袖自居，待人總是謙和、求助總是幫忙、言語總留餘地。但是，武林只要有高手出頭，難免就會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小伙子想上前挑戰。余先生曾經對「新儒家」的一部分見解有些批評，結果就引來幾年年輕人點名叫陣，用字遣詞也不怎麼客氣。挑戰者三番兩次囉嗶之後，余老只好「引經據



典」回應，刊於雜誌上，把對方的錯誤謬見一點點明，條析清楚再無疑義。當然，在我們旁觀者眼中，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一方饒罩門給另一方打」一樣，消暑解渴。有一回在中央研究院步道上巧遇余老的一位學生，當時他已經是研究員。我們開玩笑討論前述文字交鋒的結論是：對於記性如此好、知識如此深不見底的余公，千萬不要跟他打筆仗！切記切記！這位研究員說：「看看那位挨打的，慘不忍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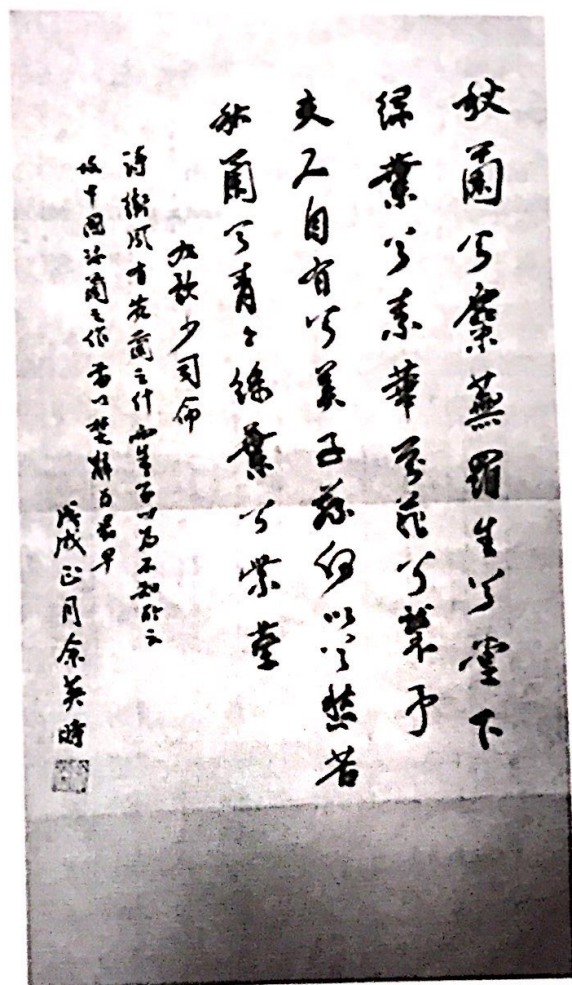
在過去十年中，因為女兒在哈佛念文學、兒子在美國東岸做博士後研究之故，我常有機會去紐澤西造訪，都順道去余府串門子。每次拜訪余先生，我總想挖出一些他的庫存知識寶藏。有時候和他聊聊新儒家，有時候談談他對共產黨與共產中國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余先生反共，有些媒體來訪問，只是要從他口中套出一句「共產黨遲早會面臨內部挑戰」之類的評論，放在頭版頭條，就算完成任務。但是我與他聊天是沒有目的的；如果一定要說目的，就是我打從心底有「喜歡被知識震撼」的期待。

記得有一回為了要聊他的新作《朱熹的歷史世界》，我硬是先把他兩冊硬梆梆的新書讀了、想了，也提出了我的問題。我請教，他書中引用了千百則史料或書信，有許多都只是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隻字片語，他焉知這些雜陳無關的資料，可以搭配互佐呢？千百則資訊又要如何串接呢？有什麼指導原則呢？余先生說，資料引索串接一則是治學經驗，另外則是他希望他所提出的詮釋，能夠「極大化歷史解釋力」。我現在回憶的名詞未必精準，但是當時我非常驚訝，因為「極大化歷史解釋」這幾個字，幾乎就是統計方法上的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這可是我頭一回從人文學者口中，聽到如此的「科學方法論」。

余院士專研思想史，但是他們那一輩的人，

常有「通儒」的內功。女兒在哈佛念書的時候，偶爾聽她提到某位教授把某篇文章從某個「社會學理論」切入的文學評論。聽或讀到這樣的文學評論，我都覺得坐立難安，好像扭了脖子或是大腿抽筋，渾身不自在，似乎是硬要把文本「塞進」某一個既有的文學理論框架。後來有機會略讀余老所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感覺其對比分析自然順暢，既合乎文本也切契結構。如果真要看文學評論，我只想讀這種有血有肉有氣的作品，不要看那些會抽筋扭脖子的鬼扯文學評論。

余老跟我說，那本紅學評論只是他的「消遣」，算不上什麼研究。我背過頭向朋友做了個鬼臉：乖乖，有這種「消遣」？這不是氣人嗎？我有一個姊姊是珠算心算的高手，她說她



余英時為常駐 WTO 代表團「2018 蘭花暨書法展」所寫的書法作品，〈九歌·少司命〉。



等紅綠燈時候的消遣，就是把前車車牌號碼的六位阿拉伯數字自乘。這種消遣，對我們這種「兩位數乘兩位數心算」都感到吃力的人而言，不也是氣人嗎？我想余老的紅學消遣，恐怕是許多知名大學博士生三、五年的苦工吧。

過去十年之間，我大概叨擾了余府好多次，最近一次是今年一月。當時，其實完全沒有辦「書法展」的念頭。拜訪過後，我們復習前一年的WTO蘭花展經驗，覺得年復一年一定要別出心裁。去年的蘭花展震撼人心，今年呢？大家慢慢調整構思，就逐漸出現「蘭花加書法」聯展的規畫。要做成這件事，就得央求余公幫忙了。

在自己做駐外大使之前，真的不了解我們外交處境的艱難與痛苦。我們經常聽到「中共打壓」，但是切身感不強烈。一定要等到你自己受到打壓，你才可能體會那種痛、那種幾乎是本於尊嚴的憤怒。我們當兵時政治作戰課程中所描述的「仇匪恨匪」，當初覺得是口號一句，現在才知道是不少外交官近乎真實的感觸。常駐WTO代表團，幾乎是台灣在國際社會唯一的正式舞台；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在這個合法舞台讓人驚豔呢？我們爭名稱、爭主權，當然是為所當為。但是我們在經貿專業社群（如WTO）整天吵名稱，是會惹人嫌的。台灣有沒有什麼強項，是不會惹人嫌卻又能為我們贏得尊重的呢？

我給余先生寫傳真，希望他「幫忙呈現民主台灣的書法之美」。余老當然了解台灣的外交困境，也希望用種種方法，呈現民主台灣

美好。我們都知道，「書法」所奠基的繁體中文，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我打算從此切入，把台灣的蘭花與書法藝術之美一次呈現。蘭花加書法能否成功，其關鍵就在於書法的贊助者是否有代表性、是否願意共襄盛舉、能否在書寫內容上與蘭花相搭配。我先問余先生贊助支持的可能性。原本誠惶誠恐，沒想到余老一口答應。一旦余老拔刀相助，邀請其餘丁邦新、金耀基、杜正勝、王汎森四位，就相對容易些了。

余老不但答應寫下墨寶，甚至以身作則到令人感動。當初，我希望受邀的五位院士，其書法內容能夠與蘭花展相搭配。余老為此廢寢忘食，聽余師母說，是「熬夜到凌晨四點才睡」。師母說，他從《楚辭》開始翻起，一路找到唐詩，挑出其中與蘭花相關的，然後再擇其優者寫為書法，總共有九幅。對於這位「還不知道Google有搜尋功能」的老院士而言，一夜遍翻群籍已經是他們能做的極限了。不止如此，余老師就其所擇，還篇篇做成筆記——關於書法詩詞的背景、關於作者、關於年代，然後，將所有筆記寄給我們。

余公筆記先說前言：「囑為蘭展寫字，已成九幅，都是古人詠蘭的詩。第一首出於楚辭〈九歌〉，是最早的作品之一，其餘八首則從《全唐詩》（共收四萬多首）中選出，而唐則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宋以下詠蘭已成風氣，雖美不勝收，但我不能多寫了」。



其時序先後如下：  
余英時寫中國古代詠蘭詩共九首

一、楚辭 九歌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綠葉兮素華，芬菲兮襲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秋蘭兮青青，綠華兮紫莖。

以下從全唐詩四萬八千餘首中選出八首，依時序排列：

二、唐太宗(李世民)《芳蘭》

春暉開紫苑，淑景媚蘭場。

映庭含淺色，凝露注浮光。

日麗參差影，風傳輕重香。

層須君子折，佩褱作芬芳。

三、李嶠《蘭》

虛室重招尋，忘言契斷金。

英浮漢家酒，雪饒楚王琴。

廣殿清香發，高臺遠吹吟。

何由應擢秀，誰肯訪山陰。

四、岑參《南溪別業》

結宇依青嶂，南軒對翠峰。

樹交花雨色，溪合水重流。

竹徑春未掃，蘭樽祀不收。

逍遙自得意，鼓腹醉中游。

五、牟融《山寺律僧畫蘭竹圖》

偶來他頂興無窮，獨有山僧筆最工。

綠徑日長袁戶在，紫苔秋晚謝庭空。

澹花影度湘江月，淺蕊香生洛浦風。

欲結葭室盟不去，忘機相對畫圖中。

六、李德裕《花藥欄》

蕙花春已碧，蘭花秋更紅。

四時發英艷，三徑滿芳叢。

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

王孫未知返，幽賞竟誰同。

七、杜牧《南溪》

南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兩發香。

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去潇湘。

八、唐彦謙《蘭二首》

清風搖翠環，涼露滴蒼玉。

美人不可不，幽香滿空谷。

謝廷漫芳草，楚畹多綠莎。

于焉忽相見，歲宴將如何。

九、首塗《幽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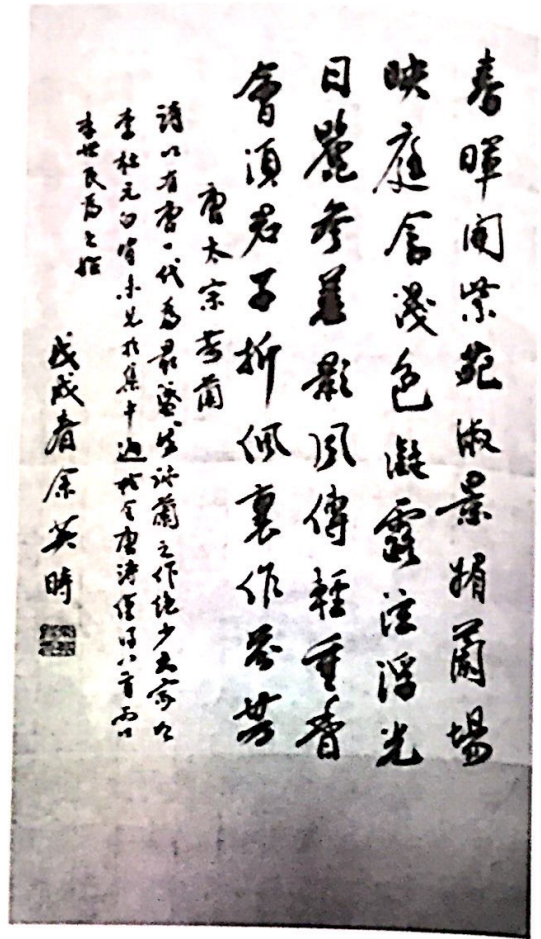
幽植象寧知，芬芳只暗持。

自無君子佩，未是國香衰。

白露霜長早，春風到每遲。

不如香路苦，芬馥欲行爲。

余英時為常駐WTO代表團「2018蘭花暨書法展」  
熬夜遍翻群籍，親筆抄錄的中國古代詠蘭詩釋文。



余英時為常駐 WTO 代表團「2018 蘭花暨書法展」所寫的書法作品，唐太宗〈芳蘭〉。


寫完前言再各篇解釋背景。例如，〈九歌·少司命〉：「詩衛風有芄蘭之葉，而朱子以為不知所云，故中國詠蘭之作，當以楚辭為最早」。又如，唐太宗〈芳蘭〉：「詩以有唐一代為最盛，時詠蘭之作絕少大家為，李杜元白皆未見於集中，全唐詩僅八首而已，李世民為之始」。余公怕我們看不懂行草，每幅字還另抄正楷以為比對。其他點注，請見附圖。

余老就是這樣的精神令我們讚歎、驚佩、感動。展覽結束之後，原作寄回，余先生又傳真給承辦的三等祕：有沒有你喜歡的哪一幅，可以送給你！這位祕書受寵若驚，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平易近人的大院士。

文後再多說一點：如果叫你去查與蘭花有關的唐詩，不准用 Google，你要怎麼找？你怎麼知道要從《楚辭》開始找起？唐詩上萬首，你總要有點印象，誰曾經寫過什麼詩之類，才能開始「找」吧？Google 幫我們把搜尋門檻降低了，任何智商一五七開根號之輩，就可以搜而尋之。但是這種完全靠 algorithm 堆砌出來的搜尋結果，沒血沒肉，對於研究或是文化智識的累積，有什麼幫助嗎？我認為完全沒有。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積與成長。

這就是我想說的：人文知識就是要靠研究者逐步的「自我累積」，慢慢成形，沒人幫得上忙。但是這種自我累積的過程，卻是實實在在，看似緩慢，然而由點倏然成面，渾然貫通。我覺得，現在的科學教育與切割灌輸，恐怕是再也培養不出余先生這樣的通儒了。我一向喜歡與余先生聊天；每一次談話本身，就像是在閱讀經典。余先生大我超過兩輪。但是經

典的定義就是：a classic is a contemporary of all times. 兩輪年齡差距，算不了什麼！

電影《一代宗師》有句話：功夫，兩個字；一橫一直。我認為「人文學者」也就只有兩個字：或通或滯。余公之後，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要彌補這個空檔，絕對不是獎勵問題，而是教育問題。 

### 朱敬一

經濟學家。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現任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表團大使。曾任台灣大學會計系及經濟系教授、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著有《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經濟學的新視野》、《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找回台灣經濟正義與活力》等中文書，其餘英文專書及學術論文百餘篇。朱院士長期關心台灣人文社會教育，一九九九年開辦「高中生人文社會營」，並親至北中南東為十餘所高中人文班巡迴講課共五個學期。今年六月，朱大使在日內瓦舉辦「蘭花書法展」，邀請余英時等五位院士揮毫聯合展出，驚豔各國大使。



【師承與私淑】

# 絕不容許任何人 以權威欺負他人！

## ——記與余英時老師的幾次談話

台北·王汎森·文

近些年來，經常有刊物邀我寫余英時老師，對於這些邀約，我基本上比較消極，一方面是害怕有誤記之處，所以下筆時心中總是相當忐忑，另一方面是余英時老師一向希望我們不要高調談論他，所以當《印刻文學生活誌》邀我寫一篇短文談余先生時，我竟有點躊躇起來了。

我與余老師相處最長的時間，當然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的五年半，但是因為當時忙著課業、忙著交學期報告，誠所謂「救死之不暇」，根本沒有留下日記或稍微詳細的記錄，以致對留學五年間的點滴，能記的實在不多。但是在畢業回到台灣之後，我與老師通過不少電話，有時也隨手記幾句話。現在我想先記我與余老師的幾次談論。第一次是我與余老師的初晤。

回想起來，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我便在若干演講場合中見過余老師了，但是並未交談過。一九八二年，《中國時報》在棲蘭山莊舉辦的討論會中，是我們的初晤。那一次與會的學者後來幾乎都當選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他的，也大多做過部長或部長級官員。作為一個旁聽者，我在那個場合學到了許多。記得我是在余老師與胡佛先生下完圍棋之後，上前請教正在撰寫中的論文《章太炎的思想》。當余老師

聽完我的構想之後，說了一些指導性的話。大概當時我提到的論點較多，余老師說了一句：「要有 focus」，這也成了後來我指導學生時常用的一句話。

余老師一向認為碩士、博士論文只是一個「練習」，所以千萬不能當作「風雨名山之業」來作，這也是他當時提到的。我當時大概提到，大陸正在出《章太炎全集》，但是因為速度比較慢，所以我手頭只有一、兩冊，有點擔心。余老師回答說：「也非必一定要等到資料全到手了才作。」

這幾句基本上是我們當時唯一的問答，也基本上確定了我撰寫《章太炎的思想》的基本路子。後來我決定集中寫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之前的章太炎，似乎也與余先生的提示有關。雖然當時我已經從《華國》、《制言》等刊物搜集了許多五四之後章太炎的著作，並準備將來繼續寫下去，但幾十年過去了卻始終未曾動手。

在那一次前往棲蘭山莊開會的途中，遊覽車經過漫長的北海岸，我記得余老師曾經盛嘆這片海岸的景色。在會議進行到一半時，因為颱風來襲，所以照明、飲食都成問題，山路基本也斷了。余先生因先前與總統有約，故由宜蘭縣警察局的警察用摩托車載下山，我們一群人



則在山上等到颱風過後才離開。

我要記的第二次談話是在將近三十年後。二〇〇七年十月，余先生獲得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該校「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學會」也在此時成立，關西大學為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專門開了一個研討會（文化交渉學的可能性——以構築新的東亞文化像為目標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余老師也趁這次機會應邀在日本中國學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

關西大學校長河田悌一教授是我的舊識，他曾經在我留學普林斯頓大學時來訪過一年，我們相當熟悉，所以我也應邀參加研討會。記得余先生在關西大學的歡迎場合致詞時說，他的任何說法都只是暫時較好的，一旦發現學生或其他人有更好的說法時，即刻服從，他提倡一種「open-minded」的學術態度。余先生並說五倫中並無「師生」一倫，雖然「天地君親師」中有「師」，但是列在最末。

在這一次訪日行程中，為了在日本中國學會上發表演說，余老師到了名古屋，路過名古屋大學醫院時，余老師說汪精衛病逝於此。我後來讀了余老師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所寫的序中提到這個醫院，才注意到原來余老師為這篇序在腦海中反覆琢磨多年了。

好像是到名古屋之前，關西大學安排「文化交渉學的可能性」研討會人員參訪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這一次行程中有拍攝「傑出華人系列」的導演及攝影隨行。記得車子停在山莊附近時，隨行的導演提到不久前到潛山錄影，聽到當地人談起余先生少年時代的兩件軼事。（余先生從七到十六歲共九年住在潛山官莊）

第一件事是抗戰時期，桂軍有一支部隊駐紮在潛山，因為杜營長胡作非為，所以余老師擬

了一個狀子準備上告杜營長。這封信寫完放在桌子上，不小心被杜的幹部看到，大為吃驚，杜遂堅持要親見執筆之人。當杜營長事件發生之時，余先生剛好到舒城縣幾天。他說回家時，村中人見之宛如蛇蠍，當時不解，後來才知道杜營長到處找他殺他。余先生當時並不甚怕，家人將他藏在族兄余平格家。後來余平格被共產黨殺死。杜派指導員來與余先生談，甚至想與余先生結拜，余先生未允而去。杜營長那邊始終猜測，這個狀子寫得文理並茂，不像出自一個少年之手，懷疑後面有一群人在指使。

當時閒談的第二件事也是發生在潛山。余先生說潛山在皖西，地貧人窮，但出外經商的人不多。有許多老輩終生未見過火車，即使到最近的大城安慶，步行也要三天。余先生在一九三七年從天津回到潛山，因為是從大城市回來，學童好奇，奉為大哥。余先生則常常請同學到飯館吃飯、記帳，後來飯館到家要債，伯父才驚覺其事。

在這次恭仁山莊參訪之時（十月五日），戶川芳郎教授報告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學問風格之不同，強調內藤重視「直觀之把握」。我記得余老師隨口對我說：「可以因此了解內藤何以特別欣賞章實齋（學誠）了。」

今年三月底，我趕到匹茲堡開會之便，繞道普城探望余老師，四月初在周質平教授的晚宴上，周教授向余先生請教了一個關於胡適的問題。周教授是有名的胡適專家，他提到劉子健先生曾經在一九五七代表匹茲堡大學寫過信極力邀請胡適到匹茲堡大學任教，但胡適日記未記此事，也未見胡適如何回應。

劉子健先生一九五〇年在匹茲堡大學得到博





上學位後，隨即留校任教，後來轉到史丹佛大學，一九六五年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劉先生也是我負笈普林斯頓大學時的老師之一，我還上過他最後一門課，上完了那門課，劉公（我們都這樣稱呼他）便退休了。

回想起在普城那幾年，劉公似乎心情鬱鬱。他常常在我信箱放置一些影印文件，有些是他參與建立台北「史丹佛中心」的相關文件，有的是他推動「宋史座談會」的文件，也有一些是嘲諷西方漢學大家的。他說有一年突然發現中國人中居然有姓「瓊」的，因為在《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出自漢學名家的文章，居然有「瓊山海，瑞汝賢」兩人合著的文集，後來才會過意來是「瓊山海瑞（字）汝賢」。

劉公與我談得很多，在他退休之後，因為沒有辦公室了，有時他約我到空教室，有時在學生活動中心，也有一次是借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教授的辦公室，我依稀記得他也提過匹茲堡請胡適之事。

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在美國的境況實在不佳，國家新亡，謀職不易。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說，普林斯頓大學居然有人提名他作一個 Postdoctoral fellowship，這個頭銜當然與胡適一代「文藝復興之父」的身分不合，但胡適感到興趣。當年五月十五日，胡適給趙元任的信說，普大校長知道該事之後，馬上決定換一個比較好的頭銜，即教授級的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

對於劉子健的邀請，胡適究竟如何考慮？余老師毫不遲疑地回答，胡適對此事的回應，見於胡適寫給趙元任的信上。我多年前曾經讀過一本台北萌芽出版社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胡適給趙元任的信》（這本小書是家弟王昱峰贈

送的），當時匆匆讀過完全不記得有這樣一封信。回到台北之後，我隨即抽出架上的書，發現果然有這樣一封信，因為該信主題是陳伯莊之死及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被圍剿的事，所以我對夾在其中的一段話不大注意：「Pittsburgh的事，我不很熱心，因為新校長上台，應該統籌全局，不當先弄一個 white elephant，引起別人譏評。所以五月十一日，新校長就職典禮，我代表台大去參加，借此向他道謝，並且說明我的看法。最後我面告他，我回台北之後，若選出來，考慮留居美國，我一定給 Pittsburgh『A1 Priority』。」（註）我看了這段，真是吃驚。余老師的天資之高、記憶力之強，學界早有公論，這不過是一個小小例子而已。

話說回來，就在十一年前，大夥參訪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時，隨行的攝影談到少年余英時準備狀告桂軍杜營長時，余先生隨口說了一句：「絕不容許任何人以權威欺負他人。」我把這句不經意的話，記在記事本上。最近，當我瀏覽網路上新載的一些余先生評論政治的話時，當年在恭仁山莊的那句話又悄悄地出現在我腦海中。

註：胡適，《胡適給趙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頁128。

###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二〇〇四年當選中研院院士，二〇〇五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研究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於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二年負笈普林斯頓大學，當時的指導教授是余英時先生。著有《章太炎的思想》、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等學術專書共十種。



【師承與私淑】

# 哈佛從學記

台北·黃進興·文



頭回看到余英時老師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剛當選中研院院士不久，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一次講演，題目是「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這個演講整理成稿後，成為以後二十年研究中國思想史「內在理路」的典範，影響極為深遠。而我當時猶忝列「批余小將」，以打倒學術權威為己志，聽了這個講演，心中若有所失。

後來因緣際會到哈佛大學念了六年書，才算真正接觸了余老師。我能夠進哈佛大學完全得力於他的推薦。一九七六年，到美國匹茲堡，還沒有註冊，聽到紐約的同學說，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要找一個人談話，這個人的名字恰巧就是我。之前，申請哈佛的研究計畫，寫得有些不搭調，要去的院系不大對頭，所以沒被錄取。大概余先生看了有點印象，他有次到台灣做演講，我在台下聆聽，卻不明就裡。同學幫我找到了余先生的電話，我打過去，余先生說：「既然你在匹茲堡大學還沒有開學，就過來波士頓玩玩。」於是我就搭了灰狗巴士，先抵紐約，再轉去波士頓。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跟余先生談了三個多小時，對我後來的治學是個轉捩點。

那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大放厥詞。現在回

想那次談話，不禁會臉紅：主要針對陳寅恪名家而發。余先生跟我半聊天、半面試時，我放言：「讀陳寅恪的東西，覺得他的表達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觀點。這引文裡的資訊ABCD非常多，最後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可是讀者初讀這一段資料的時候，並無法預知他的邏輯推論是怎樣進行的？」余先生覺得這個初生之犢，連史學大家都敢胡亂批評，當然知道是很膚淺的。但余先生十分包容，聊了三個多小時後說：「你明年轉到哈佛來吧！」我那時尚未遞出申請，就知曉可以進哈佛大學了，不禁喜形於色，難掩內心的興奮。

後來回到匹茲堡大學見到許倬雲先生，老實供出實情。許先生說：「既然你的興趣在思想史、學術史，還是跟余先生比較好。」在匹茲堡這七個月裡，我便跟著許先生做一些導讀，瞭解他的學問，也有不少收穫的。

但我剛到哈佛大學那一年，余英時先生即受耶魯大學禮聘為講座教授，一時無法親炙教誨。

哈佛大學的六年讀書生涯，是我夢寐以求的快樂時光。以前在台灣大學讀書時，無法早起，經常日正當中才去課堂；遲到或曠課乃是常事。而到了哈佛大學，早上五、六點每每就



自然起床，醒來便士氣昂揚，想直奔課堂，目睹列聖列賢的光彩（註1）。又性喜逛書店，嗜書如癡，有位朋友到我的宿舍，看見藏書堆到天花板，就說：「幸好波士頓沒有地震，不然那麼多書倒下來，準把你壓死。」

初始，我的研究方向係西方思想史和史學史，後來起了變化，跟兩位老師有絕大的關係。其中一位是比較思想史的大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那時我的西方思想史題目也定了，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你有這樣的底子，做西方的學術當然很好，但是在西方不乏有人可以做得更好，將來恐難脫穎而出。為什麼不回去做中國學問？一般做中國學問的人沒有你這般西學的底子，有不同的眼光和訓練，說不定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當時聽了有些洩氣，好像史華慈看輕了我之前西學的努力。後來心情沉澱之後，也覺得不無道理。又去請教余英時教授，方才定案。其實余先生由哈佛大學轉任耶魯大學，並沒有正式教過我，我讀書跟的是余先生的老師楊聯陞（1914-1990）教授。可是我上楊教授的課只有第一堂和最後一堂。第二堂去的時候，教室空無一人，我覺得奇怪，怎麼請假也不講。後來從系裡知道，那時他的精神不佳。

史華慈先生說：「既然你問學有這樣的轉變，得在中國學方面多打點基礎，我介紹你到耶魯去跟余英時教授好了。」他顯然不知我事先就認識了余先生，我則喜出望外，順理成章接受了他的好意。當晚史華慈先生打了電話給余先生。之後，我每隔兩、三個月就會去余先

生家住一、兩晚。這是我一輩子讀書最愉快的經驗。我和同學康樂（1950-2007）兩個人一起去，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點。因為聊得太晚，就乾脆在余先生家打地鋪，醒來再聊，下午才走。

康樂原本就讀耶魯，為人熱情而有理想，對政治獨有見解，常跟余先生做台灣輿情分析。我則把握難得的機會作了很多的提問。余先生在耶魯時，恰值創造力的高峰，佳作如活水源源不絕。每回一有新作，他總會讓我們先睹為快，我們算是最初的讀者。有時我們就提供一些意見，我充當主要批評者，雞蛋裡挑骨頭。那時等於讀了兩個學校，耶魯和哈佛，常常來來去去。余老師和師母除了在學問指導我們，生活也幫了很多忙。我們在高談闊論時，師母便忙著做飯、準備晚餐與宵夜。師母對我們很體貼，很照顧，我內心由衷地感激。

在哈佛，我打了一個比較全面、紮實的底子。那時受余英時先生影響，且戰且走，一方面彌補舊學的不足。但在哈佛，史華慈雖是我真正的指導教授。可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十八世紀中國的哲學、考據學和政治：李紱和清代陸王學派》（*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Wang School under the Ch'ing*）卻是余英時先生給的。他的設計頗有深意，刻意找一個冷門的題目，令我無所依傍，沒有二手資料可以參考，唯一的只有太老師錢穆（1895-1990）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章專門寫到「李紱（1673-1750）」。所以我只有把李紱的文集一



本一本地翻閱，歸納出自己的看法。我的博士論文寫得相當順利，大概一年九個月就完成了初稿。當然並非個人天縱英明，而是有個學識淵博的老師做指引。當每寫完一章就呈請余先生過目，看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進行，而不是胡扯一通。他說這個方向是對的，我就繼續寫下去。此外，史華慈教授對內容也有所批評與指點。猶記得他曾笑，我論文寫了大半，主角「李紱」還未粉墨登場，彷彿故布疑雲的偵探小說。後來論文完成之際，史華慈教授卻難掩失望之情，似乎覺得偌多我在哈佛所浸潤的西學，毫不見蹤影，無從發揮。臨別之時，諄諄告誡有朝一日，應將中、西學問融為一爐。

但拙作整體而言，關鍵的還是余英時先生的指導。畢業數年之後，酌加增訂，幸運地被劍橋大學出版社接納出版，這起碼對得起師門了。

近來大陸有人要研究李紱，想翻譯這本書(註2)。我說：日本也有學者寫李紱的，但自己還未取閱，應該可以參考。我想日本學者或有不同的見解吧！因為李紱是清代陸王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罕有人注意，相對隱晦。他是一個次要的思想家，因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氣候。因為第一流的思想家、學者，往往超越那個時代，走在前面，要談朱熹、王陽明的哲學反映了當時什麼具體的狀況，並不容易。但李紱更能反映當時學術和政治的氛圍。

我求學時，哈佛大師雲集，遊學於各名師之間，雖其樂融融，但如前所述，實際上受史華慈和余英時兩位史學大家的教益獨多。記得

有次余先生偶過波士頓時，有一晚電話召我聚談，難得有機會在名家前面表達己見，隨意暢談，只見余先生頻頻點頭說：「年輕人立志不妨高，但不要犯上近代學者鋼筋（觀念架構）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那天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宵夜，我聽余先生一再說：「做學問說穿了就是『敬業』兩字。」從古人的「聞道」到余先生的「敬業」，我靈光一閃，似乎看到近代學術的真精神。

年輕時，曾經有一段時間身體並不太好；一向很崇拜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夢想去非洲當無國界醫生。余英時先生聽了說：「你的身體這麼差，不要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很不錯了。」方才有所醒悟。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我練起了羅漢功，身體大有起色。四十歲以後身體才慢慢變好。我太太說，嫁我很不值得，一年有半載都躺在病床上。學問做得很辛苦，練了羅漢功，沒想到身體就好了，總算度過了人生最辛苦的階段。

一九八二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初稿，本來繳上去了就可以畢業，但系上祕書告訴我明年的獎學金已批示下來，為了貪得多留一年在哈佛，我又將論文取回。其實，我的獎學金都是史華慈老師一手的「傑作」。他常怕我挨餓，有次竟然問有沒有食物吃？為了讓我一心向學，他安排了無憂無慮的獎學金。其他同學似不明就裡，只看到我整天閒蕩，逛書店、到外系聽課，不必帶學生、當助教，有點奇怪。

那年余老師復推薦我申請到國際朱子學會論文發表的機會，不意增長了不少見識。那一次



大會值得大筆特書：大陸甫開放，代表團裡包括有李澤厚、任繼愈（1916-2009）等著名學者，最引人注目則是馮友蘭（1895-1990）。但在幾天的會議，大陸代表卻刻意與他區隔，在餐桌上他與女兒兩位孤零零地用餐，不明緣故的我，心裡很不忍。余老師、陳榮捷（1901-1994）老先生偶爾會過去跟他寒暄兩句。

日本方面的代表團陣容龐大，不容小覷，居中漢學泰斗島田虔次（1917-2000）教授更絕少出席國際會議。由於他念過天津中學，中文甚佳，居間常有請益的機會，有回他言道，雖與余教授的學術論點不盡相同，卻不能不推崇他是當今中國最了不起的學者。這個評斷，迄今記憶猶新。

另外，鮮為人知的，余老師在耶魯任教期間，對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甚為關切；他且一度為美麗島事件（1979.12.10）投書《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替黨外仗義直言。有趣的是，當時代表國府立場反駁他的卻是日後當上台灣總統的馬英九先生。

該時余老師為台灣作育不少人才，他臨別哈佛之際，除了收了我，還有洪金富、丁友兩位同學。在耶魯時，更收了康樂、陳弱水、周婉窈等台灣的留學生。他認為有必要為台灣培養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後來回到台灣也各自在學術教育學界堅守崗位，不負所望。開放之後，他復積極栽培大陸年輕學子，為中華文化做薪火相傳的工作，此是後話了。✍

（作者按：本文根據前作〈師門六年記〉增補而成。）

#### 註釋

註1：當時哈佛人文薈萃的盛況，容可參閱吳詠慧，《哈佛瑣記》（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9；北京：中華書局，2009）。

註2：目前已有中譯本，但欠理想。

#### 黃進興

台灣大學歷史學學士（一九七三）、碩士（一九七五）。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三年，遊學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指導教授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與余英時兩位先生。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及史學理論。著有：《哈佛瑣記》、《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和《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等。其著作或有英文、日文、韓文等譯本。二〇〇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研院副院長。



【師承與私淑】

# 有關余英時老師的回憶二則

台北·陳弱水·文



余英時老師的回憶錄即將出版，《印刻文學生活誌》為此出版專輯，邀我寫一篇有關余老師的文字。余老師出版回憶錄，是一件盛事，我的求學與研究生涯和老師關係非常密切，理當有所貢獻。不過，我在二〇〇九年曾經寫了〈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收入余老師八十歲壽慶論文集《文化與歷史的追索》「前言」，內容集中記述了我對余老師的回憶，這一篇要寫什麼，頗費思量。余老師是當代學術與思想大家，著作非常多，也接受過不少次訪問，這些著作和訪談錄內容豐富，涉及各種各樣的學術、文化、政治議題，很值得我們深入了解。但這樣的事需要醞釀，現在這篇小文還是描寫我對余老師的印象和回憶。

本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我在前往耶魯大學求學，成為老師的學生之前，對於老師的了解和印象。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到耶魯之前並沒有和老師正式見過面，但他對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對他也有一些了解。我把這部分寫出來，除了可以算作台灣知識界對余老師「接受史」的一個樣本，說不定還有助於大家對余老師的認識。本文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回憶耶魯歲月的余英時老師〉一文之外，有關老師的零星追憶。

## 一

第一次聽到余老師的名字，是在電視新聞上。余老師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當選中央研究院第十屆院士，當晚我從電視上看到新聞。當天當選的人文組院士除了余老師，還有張光直、方豪、蔣復璁三位先生，我知道在台灣的方豪和蔣復璁，但從沒聽過余老師與張先生的名字。我當年正好考大學，七月十六日還沒放榜，但我已知道自己大概會進台灣大學歷史系，因此對余老師充滿好奇，入學後就留意有關他的訊息，張先生是考古學家，我也注意他的研究成果。

在我到耶魯之前，余老師對我發生的影響大概有三個方面，先從最重要的說起。余老師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於一九七六年一月一連七天在《聯合報》副刊連載。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我並不知道其他人的反應，但自己深受吸引，記得文章連載期間，我每天一早就從家裡走到北投市場去買報紙，完全處於「先睹為快」的心情。幾個月後，這篇文章的姊妹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刊出。很明顯，這兩篇文章奠下余老師在台灣知



識界與人文學術界的影響力與重要地位。

我當時是大二學生。大一下學期時，林毓生先生來台大歷史系客座，開授一門「思想史方法論」的講演課，我前往旁聽，得知世界上有思想史這門學問，深受啟發，開始閱讀有關著作，其中也有余老師的作品。但〈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兩文性質不同，它們是在專門研究的基礎上以通貫的方式探討中國思想與政治史上核心問題的宏大之作，而且具有現實的意義，對當時很多年輕知識人帶來衝擊。我自己不但被文章中的問題和論點吸引，而且因為我是學歷史的，不知不覺也想把這樣的取向帶入自己的學習與思考。自此之後，我就更留心老師的著作了。

前面說過，我開始接觸余老師的著作，是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刊出之前。我最早接觸的著作之一是《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有關明末遺民方以智（1611-1671）的研究。我是在當時位於羅斯福路四段口的學生書局發現這本書的。這應該是余老師一本比較冷門的著作，它是考證之作，又是用文言文寫的，我卻深受吸引。這本書文詞優美，而且從余老師何以會發現方以智晚節這個問題，就深具偵探的趣味，考證的終局又有嚴肅的心靈與文化意義，這也是最早啟發我如何進行考證的作品。我讀來興趣盎然，不時跑到學生書局去看，就這樣倚著書架幾乎讀完。《方以智晚節考》是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的，對當時台灣的大學生而言，香港的原版書有如天價。我不斷站著讀，不知什麼時候，終於狠下心買下來。除了這本書，我還託人到香港買了余老師在龍門書店出版的《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這兩本港版書現在還在我研究室的架上。

主要透過《方以智晚節考》與《論戴震與章學誠》中的論文，我發掘了自己的第一個研究興趣：明清之際思想史。我也閱讀梁啟超和錢

穆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名的兩本書），又根據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的指引，閱讀一些明代中晚期的文集。《方以智晚節考》其實顯現了余老師學術工作的一個特殊風格。這本書寫作的因緣，是再偶然不過了。余老師一九七一年夏天初次到台灣，無意間聽說學生書局已影印黃宗義《授書隨筆》問世，老師聽了大感疑惑：黃宗義此書雖然見於著錄，三百年來無人看過，天地間是否曾有此作，也不能確定，為什麼現在能夠出版？後來取得該書，考索後得知，這其實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的《古今釋疑》，探討此事過程中，又發現方以智晚節與死節的疑案，老師遂放下考證《古今釋疑》的文章，另外撰成《方以智晚節考》。一本書因一篇十餘頁的文章而起，卻先於文章完稿，實在是趣事。余老師的其他研究，也頗有起於偶然事端的，他對陳寅恪、《紅樓夢》、胡適、朱熹歷史世界的探討，都有這樣的性質。余老師對這些課題，偶然發端之後，往往又繼續追索，而終有重大的成果。他不斷透過偶然的機緣迸發出深刻精彩的著述，不能不說是平日素有準備而又習於深思的緣故。

在大學期間，我對余老師另一方面的印象來自他的香港生涯。余老師在香港住過兩段時間，第一段是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在新亞書院就讀，也活躍於流亡至香港的知識人圈；第二段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當時新亞書院是中文大學的成員校之一，一九七七年始降低位階，校長改為院長）。我大一下學期時，在台大研究圖書館有系統翻讀台灣幾十年來被黨國體制壓抑而坊間難以見到的雜誌，如《自由中國》、《民主潮》，我也看一些早期的香港雜誌如《民主評論》、《人生》。我注意到余老師到哈佛大學深造之前，在香港發表了很多文章，



出版好幾本書。老師是《人生》雜誌的作者，我在該刊的一張作者合照中看到他年輕清瘦的身影。其實，在一九五〇年代，余老師大多數文章發表於《自由陣線》和《祖國週刊》，這兩份是自由派（所謂「第三勢力」）的刊物，因為政治因素，難以進口，台大幾乎都沒有收藏。

余老師香港時期的著作主要討論民主、自由、平等、文明、革命等問題，我沒有讀過書，也許看過幾篇文章，但光從書名和文章題目，就可以看出他的基本關懷和價值取向，他思考中國變局與馬列主義的關係，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余老師發表作品，除了本名，最常使用筆名「艾群」，我猜「艾群」是「愛群」的諧音，透露了他關心人群（特別是中國人）集體命運的心情。根據余老師的著作目錄，僅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三年間，他就在香港出版了六本關於近代西方文明與民主問題的書籍，這是非常驚人的，因為他當時正在中國典籍和歷史方面下工夫，也參與雜誌和出版社的編務。這些著作大概都是在深夜不眠中寫出的，除了青年的體力與活力，對真知和理想的追尋更是支持這項工作的動力。

我進大學時，余老師正在擔任香港中大新亞書院校長，我因為特殊的個人機緣，從小有閱讀香港報章、雜誌的習慣（但進口管制甚嚴，能看到的很有限），因此偶爾就在台大圖書館翻覽新亞書院的院刊《新亞生活》，了解了余老師的一些動態。當時新亞書院在華人高等教育界有很高的地位，余老師的繼任者原來是在康乃爾大學任教的著名經濟學家劉大中，劉先生因病無法赴任，不久就和夫人戡亞昭女士雙雙自殺。余老師還寫了一篇文章，向師生介紹這位未到任的校長。

余老師卸任後，我繼續看了幾年《新亞生活》，這大概是因為當時台灣氣氛沉悶，閱讀這樣的刊物猶如在身邊無形的壁牆上開了一個小窗口，讓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吹進來。事有湊巧，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到中文大學歷史系履行我擔任該系外部監察員（external examiner）的職務，歷史系安排我住進一間校內的招待所，剛好就是余老師擔任新亞校長時的寓所，我特別告訴了老師和師母這件事。這間房子現在已拆除，原地成為伍宜孫書院的一部分。

我到耶魯之前只看過余老師一次。那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他暑假來台，當天在台北重慶南路二段現在中華文化總會的大樓舉行演講，主題是清代學術，我前往聆聽。到場的人很多，我的座位在相當後面，遠遠地看余老師，感覺面目有些模糊。演講的主持人是屈萬里先生，余老師演講結束後，他給了幾句結語，主要的意思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雖然出國前沒有機會和余老師見面，他從台大的一些師長、學長間對有所聽聞。我在金門服兵役時，他託人帶話，表示我如果考慮留學，可以申請耶魯。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緣由。

## 二

以下是幾點我就讀耶魯大學時與余老師交接的追憶。我這方面的記憶大多已寫出，這裡要講的真的非常零星。我在耶魯時，約有兩年與老師接觸密切，長談的機會很多。除了談學術，老師有時也會提自己以前的事，大概由於我原來對老師已略有了解，他談這些並不顯得突兀。因此，我後來讀他的回憶文字如〈我走過的路〉以及網路上已能看到的回憶錄前三





章，都感到很親切。當然，有了這些文字，我對老師的認識就遠比本來完整了。

和老師談話間，他不少次提及少年時期在安徽潛山的情況以及官莊鄉的農村社會，他會稍講農村經驗與大城市的差異、農村與現代新思潮的關係，以及農村經驗對他的知識工作的影響。我不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但老師的回憶和思考對我在中國社會的認識上有所啟發，對個人也有觸動。我後來特別找機會詢問家父他家鄉的情況（江蘇泗陽老陳圩，現屬宿遷），也向舅舅打聽家母的父方（漢口、湖北黃陂）與母方（廣州、廣東中山）的家族訊息。我打聽後得知，家母的父母兩方都屬於工商背景，家父蘇北內陸農村在二十世紀初、中期的情況也不同於我從學術論著所理解的南方宗族社會或余老師的家鄉，而且從舅舅的講述看來，廣府文化與漢人社會其他地方差異不小。最近四川大學羅志田教授表示，近代中國史研究中縣、鄉、鎮層次的論述迄今仍非常薄弱，呼籲加強基層檔案的運用。歷史研究要進入地方社群很困難，即使在資料量大的近代史領域也經常如此，但對人的經驗、行動與嚮往的了解而言，這個層面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和余老師的談話中，政治有時也是話題。老師常說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他對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很關心的，也很有洞見。老師從來沒在台灣住過，我談的一些事，表達的一些看法，或許對他有過幫助。老師也會談民國政治，談中共，我也受益。老師有極深的民族情感，我親眼見過這種情緒的表達，但他對政治實態有很清明的觀察，也有他的價值取向，因此能夠穿透表象和宣傳，不為民族主義所輕惑。這也是他幾十年來基本立場一直堅定不移的原因，即使一九七〇年代前期保

釣運動風起雲湧，牽動了多少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學生，余老師仍然沒有因之搖擺。

在耶魯時，還有一件關於余老師的事讓我留下印象。有一次，中國清史名家王鍾翰先生來訪，我帶他到一家餐館吃飯，算是協助老師接待訪客。席中談起，余老師一九四九年就讀燕京大學歷史系時，王先生在該系任教，余老師沒有修過他的課，但這次仍待王先生以師禮。王先生接著笑說，余老師在燕京待的時間很短，對他沒什麼作用。意思是，余老師客氣了，對於他的成就，燕京並無功勞。這讓我聯想起，當談起自己的求學經過（大多是回答他人的詢問），老師最常使用的形容是「轉益多師」，「轉益多師」其實就意味自學的成分很高。余老師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五六年輾轉念了四所大學，他的多師有其時代環境的因素，但在任何情境下，自學和自我努力在人生的奮鬥中都應該占有重要的分量，不是嗎？

### 陳弱水

一九五六年生於台灣屏東。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並長期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為台大歷史系特聘教授、台大講座教授。行政服務方面，曾任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台大共同教育中心副主任、台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著有《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等學術專書四種及論文數十篇。



【師承與私淑】

# 猶記新港雪天歡笑時

台北·周婉窈·文

今年三月十日，蘋果電子報有一篇報導〈【專訪】八十八歲余英時寄語港人：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內中附有香港記者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余英時先生的短片。余先生一直很關心香港，報導寫道：轉眼香港回歸二十年都過了，學生、抗爭者都因社會運動坐牢了，此時此刻，他認為只得繼續清醒。「許可下盡量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我想香港人，尤其香港的學生、年輕人，在險惡的局勢下，讀來應該特別有感。

讀了這篇報導，腦海浮現的是「不忘初心」四個字。在「中國崛起」之後，我們年輕時代奉為自由派的大師——「改宗」之後，感受格外真切。另外，非常有感的是，在短片中看到余師母陳淑平女士還是一樣不怕冷，冬天穿短袖衣服。聽到余師母和余先生熟悉的聲音，尤其是余先生「哈哈……」的笑聲，看著室內的布置，想起過去幾次到過普林斯頓余府，知道哪裡是哪裡。

一段影片勾起零零碎碎、跨越時空的記憶。記憶的起頭在美國康乃狄克州新港（New Haven），耶魯大學所在地。一九八一年八月我和陳弱水出國留學，我到加州史丹佛大學，

弱水到耶魯大學，那是他最想去的地方，因為余教授從哈佛大學轉到耶魯大學，他一心想向余教授學習。由於兩校相隔甚遠，我在史丹佛大學讀了一年之後，決定離開該校到新港，美國沒有轉學制度，於是重新申請。很幸運的，過了一年，我進入耶魯大學博士班，指導老師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耶魯和哈佛很不一樣，哈佛很熱鬧，人來人往，耶魯僻居小鎮，不在交通要道上，要特地來才會來的，比較清靜，或冷清——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余先生當時五十多歲，算是學術生涯的壯年，余師母年紀稍小。耶魯台灣學生一向不多，歷史系在我們之前，只有鄭培凱、康樂；另有人類學的陳其南。人文學科之外的學生也不多。可能因為人少，反而和老師比較有機會接觸，去過余先生在郊區的住家，吃過師母做的菜，也有幸認識余家二千金。

影片中記者訪問余先生，是大風雪剛過，天氣很冷，余師母穿短袖，讓我想起對余師母的第一印象就是不怕冷。某個冷冬，也許是舊曆年前後，余先生邀請大家到府上作客，西方方式的party。怕冷的我，穿著厚毛衣，余師母卻光著腳忙進忙出，廚房地板應該很冰冷才是，記得有問說：「師母，怎麼這麼不怕冷？」忘



了師母怎麼回答。當時另一印象深刻的是，師母做 muffin (鬆餅) 給大家吃，看著師母從烤箱裡拿出整盤鬆餅，很驚訝。那是三十多年前，當時的台灣幾乎沒有超市，我也沒看過烤箱，店裡才可能買到的糕點，竟然可以在家裡自己做！師母說非常簡單啊，拿出一盒鬆餅材料，說只要按照指示，調一調，放烤箱就可以啊。真的是長知識了，現在大家當然不會覺得有何神奇的地方。

那一天余家二千金都在。那時候大女兒讀耶魯大學，小女兒記得才九歲大。

人生有階段。後來我們知道余先生離開耶魯到普林斯頓之後，好像就很少請學生到家裡作客，王汎森、林富士等學生都沒見過兩位女兒。人生有階段，這也是我後來的深切體驗，一九九〇年代後半，我回台灣工作時，還會延續在美國、加拿大時在家宴客的作法，有一套可以請十二人的餐具和食譜，分別請過學生、同仁、長輩等，但不知不覺中就無法繼續了。所以，我們算是余師母還有體力和興致請學生到家裡作客時期的學生吧？

剛到新港時，我就聽說余家大女兒也剛上耶魯讀書。那時候，耶魯大學亞裔學生不多，每次看到亞裔學生就會注意一下。有一次，在

Woolsey Hall 和 Beinecke 善本書圖書館之間的廣場看到一位女學生，直髮垂耳，容顏給人一種特別沉靜的感覺，彷彿哪裡看過。回家後我告訴弱水，我可能遇到余先生的大女兒。後來見到面，果然就是她。

大女兒有一個很好聽的英文名字，取自才華洋溢的美國女詩人的名字。在此姑隱之，倒是余先生和余師母平常叫她中文小名，很可愛的小名。有一次，不知為什麼，我和弱水坐在余先生的車子後座，余先生途中接大女兒，她坐在副駕駛座，余先生一面開車，一面告訴她，這要這樣，那要那樣，原來是教她開車的一些要訣。那時應該是她開始學開車吧，一幅很美國的親子圖景。這也是難得看到的余先生的日常吧。

那天的家庭 party，大女兒還是文文靜靜的，倒是小女兒正是好玩的年紀，要我們和她玩捉迷藏，大家到處躲，所以我也躲到樓上去了——一般作客不會到的地方，很失禮，但樓下沒地方躲啊。印象最深的是，在地下一樓一個大約是多功能的空間，小女兒主動要唱歌給我們聽，那時候輕歌劇 *Evita* 很紅，演阿根廷總統斐隆夫人艾薇塔（伊娃）的故事，主題曲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阿根廷，別為我哭



泣)風靡一時。九歲小女孩引喉高唱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聲音響亮，表情活靈活現，一時把我們都逗笑了。當然，那歌詞其實是有令人悲傷的地方。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少知道阿根廷總統胡安·斐隆，一九七四年他在總統任內過世，他的第三任妻子繼任總統，最後被軍事政變推翻。艾薇塔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死時才三十三歲，是傳奇性的存在。

不記得到余先生、余師母家中作客，共有幾次。印象很深的還有一次，是一九八六年菲律賓「people power」(人民力量)革命成功之後，馬可仕勢力崩解，艾奎諾夫人柯拉蓉當選總統，一時成為風雲人物。我們都很興奮，熱烈討論，自然也談到台灣，那時還是戒嚴時期(各位讀者，當時沒有人會預知有解嚴之日)，賓客中有黨國菁英，不能自由交談。我只記得我暗自希望台灣也會出現「people power」運動。那時深切感受到，故鄉永遠就在你的心裡。

一九八七年，余先生接受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離開耶魯大學。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弱水還因此在耶魯大學教了一年書。一九八八年，弱水獲聘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簡稱UBC)教書，我們於是搬到該大學所在地溫哥華居住。我一面到UBC聽課，一面寫博士論文。第二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全世界譁然。我們聽說余先生和余師母積極募款幫助在美國的六四相關人士，也提供住處給脫逃出來的人士暫時居住，救援不遺餘力。後來我們到普林斯

頓探望余先生和余師母時，余師母和我講了一些具體的細節；她對他們救援的若干特定人物也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觀察。余師母提及小女兒非常同情六四事件的學生和參與者，自己就做個募款箱，募起款來。我們在余府時，小女兒正在畫一張海報，嘲諷中國當權者，畫了某種動物作比擬，我記得大女兒走過，看了一下，說：「abusive」，至今印象深刻。

我們到加拿大之後，應該有兩次到普林斯頓探訪余先生和余師母。余先生是非常客氣的人，也很有體恤之心。有一次，他看我們搭灰狗巴士遠道而來，大概疲態盡露，他堅持要我們到兩個女兒的房間休息。兩個女兒共用一個房間，各有一個單人床，是那種有床罩的床，垂吊不少飾物。另外一次，我們必須過夜，余先生堅持我們睡主臥房，也就是說他和師母讓出主臥房，兩人去睡可能比較狹小的客房(沒看過)。因為余先生很堅持，我們只好遵命，但真的感覺很不安。當天晚上，可聽到客房隱隱約約傳來兩人的談話聲，那時候就在想，兩人有這麼多話講，真的是感情很好的夫妻。

這篇回憶文章，其實最想寫的是師母。我不是余先生指導的學生，領域也相差很遠，他的書看過幾本，但無法探其堂奧，這些也輪不到我來寫，倒是很懷念和余師母接觸的往事，也頗有受教之處。有一句俗話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女性」，我不想用這個俗套，首先，余先生成就非凡，但好像很難用「成功」來講，然後，余師母也不是站在背後的人。我成長過程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不願



意把女性當背景。根據我粗淺的認識，余師母個性活潑，思想很有彈性，對事情充滿好奇，也很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我認為他們兩人的個性比較像互補，在人情世事上，我想余師母應該提供余先生不少不同的觀看角度。余先生在北美漢學界一直處於核心，余師母參與其間，半世紀以來，不知見識到學界多少滄海桑田？這裡當然有國際形勢的起伏變化，比如，美國從沒有中國留學生到處都是中國學生；有一陣子幾乎所有他們認識的西方學者都和太太離婚，娶來自中國的女性或女學生。從余師母偶爾和我分享的訊息，也可以看到她有很多「看透」的地方，這些寫出來，大概會被認為是八卦，終我一生應該不會寫出來，但這些具體事物確實幫助我了解人世的許多不為人知的面相。

余師母很能自得其樂。在女兒都不住家裡之後，她常陪余先生參加國際會議，她喜歡歐洲，余先生開會時，她就自己去看博物館、看各種展覽。她平常就喜歡看展覽，送過我看展覽買的圖錄。她也參加普林斯頓當地人（不是華人）組成的讀書會，有一次大家選了鄭念的英文書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與死》，一九八七年出版），由師母邀請作者來和大家見面。師母說，鄭念一口就答應，非常親切，主動說不要花錢安排住宿，就住他們家。鄭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整肅，被關六年多，出獄後才知道女兒自殺。這是她唯一的小孩，一生似乎都無法克服這個痛。不過，現在很多人大概都將這些慘極人寰、大不公大不

義的事情，當作過眼雲煙吧？鄭念被當成「中國真正的名媛」，或「最後的貴族」來說嘴，人用會流血、會痛的身體和心所流的血，所承受的痛，不過就是個故事。

余師母喜歡看書，看小說，我也間接受惠。大概因為我也喜歡看小說，師母寄來過幾本書給我，書架稍微巡一遍，就有兩本。一本是，英國哲學家兼小說家 Iris Murdoch 過世後，她的先生 John Bayley 寫的回憶錄 *Elegy for Iris*（台譯《輓歌——寫給我的妻子艾瑞絲》）。另外一本是印度裔女作家 Jhumpa Lahiri 的短篇小說集 *Interpreter of Maladies*（台譯《醫生的翻譯員》）。收到書後，我都有看，可惜，因為工作很忙碌，好像都沒「回報」讀書心得。

或許知道我忙碌，後來師母不再寄書來，倒是寄了她家門口小池塘養的鯉魚照片，她對於鯉魚可以在冰下過冬，幾個月不吃東西，雪融後又生蹦活跳的，嘖嘖稱奇。她偶爾會打電話來聊一下，我告訴她，我們家養孔雀魚，很活潑，每一隻都有自己的個性。師母非常好奇，要我也寄照片給她看，但孔雀魚非常小，有些不到一公分半，游得飛快，很難拍照，我是拍了照片，卻一直拖著沒去洗出來——現在洗照片很難啊（藉口無誤）。

最後要講一件受教於師母的事。我回台灣後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工作。有一年院士會議期間，有幾位院士要將「台灣史研究所」改為「台灣研究中心」，我和幾位年輕同仁起而抗拒，理由在此無法詳述，簡單來說，台灣人一百年來無法學習自己的歷史，怎






能將「史」字去掉，變成大雜燴呢？況且，哪有在自己的地方將自己籠統他者化，變成「某某研究」的？我們除了在報紙發聲之外，也「奔走當道」，希望能改變院士們的看法。我當時自動請纓，去遊說余先生，我回報同仁說余先生會支持我們。結果第二天，報紙報導出來，余先生完全站在其他院士那邊。後來，我想，主導此事的某院士和余先生相識三、四十年，而我不過是他的學生的太太，他會選擇聽誰的話呢？過不久，余師母約我到中研院咖啡廳見面，她沒直接提這件事，但我想她是要說這件事，她說（大意如此）：「自己的事情還是要靠自己。」余先生是極端敏感的人，我想他就算沒看到我的反應，也會猜到我很失望，或許他請余師母來說一下，或許就是余師母自己想來提點我，總之，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啟示。我們還是繼續奔走，後來終於擋住改名——改名牽涉到實質的研究方向。不久前，我在電腦中看到我為了此事寫給李遠哲院長的信，有不堪回首之感——若非看到信，真的不復記憶了。不過，也因為此事，我知道奔走請求協助是必要的，不能放棄任何機會，但最終的最終很可能就只有自力救濟一途。人生很多時候，就是孤獨之旅，他力本願是理想，也可能是幻夢。

回到「不忘初衷」。余先生肯認自由民主，無法接受中共統治中國的方式，鑄造了「黨天下」一詞。這些都不需要我來講，我想講的是，他的同輩學者幾乎都稱讚當代中國去了。余先生本來就不愛熱鬧，有一次余師母在電話

中說，他們現在很少出門，因為參加聚會，有人就會說：現在中國挺好的，不像你說的，怎麼不回去看看呢？「不忘初衷」不一定是好事，如果年輕時錯認了一些價值，後來省悟了，有所改變，當然很好，不然，台灣就沒有改變的可能。不過，余先生年輕時肯認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他沒有因為其他因素而放棄核心信念，始終如一，讓我很欽佩和感念。

余先生即將出版回憶錄，很多人都等著看。雖然「功成名就」，我想，余先生還是在走一條孤獨的路，他最大的期望應該是能看到一個自由民主、文明有禮的中國，這是世間再多的桂冠和光環都無法相比的。孤獨雖然孤獨，畢竟是自己選擇的路，更何況再怎麼孤獨，就是有一位好伴侶同行。中國文化中說「夫婦以義合」，講得很好。「義」通常相對於「血緣」，又有正確合適之意。

最後，想起余師母的話帶來的體悟。我相信，在追求台灣成為不退轉的自由民主國家的路上，我們都是孤獨的行者，但以義合，給了我們力量。孤獨是身影，也是意志，眾志終將成城。 

### 周婉窈

台灣嘉義大林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史、十七世紀東亞海洋史。著有多種歷史學論文與書籍，致力於台灣史普及工作，關心公共議題，如歷史課綱與轉型正義等。作者出版兩本散文集《面向過去而生》（允晨，2009）與《島嶼的愛和向望》（玉山社，2017），前者入圍第三十四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獎。





二〇〇二年四月下旬，本文作者蘇曉康（右一）偕同妻子傅莉（左二）拜訪普林斯頓余府。在餐廳與余教授夫人陳淑平女士、美國友人合影。

【師承與私淑】

## 忽到龐公棲隱處

馬里蘭州·蘇曉康·文、照片提供

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二〇六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

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〇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



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罩，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複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兩件墨香新文，當夜令我讀得癡醉而驚嘆：一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〇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證，恐為當今觀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著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

大陸卻未覺「天蠻地荒」，也熟睹「衰翁變姪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煉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纔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梁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一九一五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器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譯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名媛，都是何等了





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少四壯集」，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裡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颳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很多年來，一遇惡劣天氣，老兩口常常幾天沒有音訊，我就會擔心他們。九一一以後，普鎮居然有一次也發現炭疽信件（編按：二〇〇一年九月於美國發生，寄發含有炭疽桿菌信件的生物恐怖攻擊）周遭一派恐慌，余太太只好把余先生放進一家旅館去，因為他還得趕稿子。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叢林裡，除了一根電話線，沒有電腦，也沒有網路。

二〇〇一年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是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發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發去研究，如王汎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士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

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坐擁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閒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復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統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裡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遷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裡，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二〇〇〇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



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占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講稿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二〇〇六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摒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

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二〇一一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資訊傳真過去，因為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採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捨，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麼？」「《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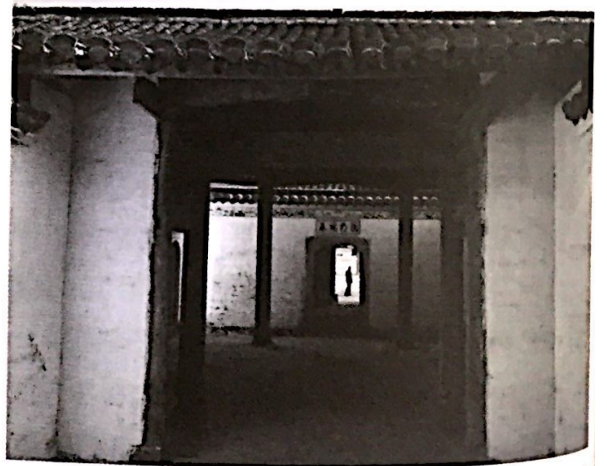
二〇〇〇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一九五三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幾年，從未向外洩露這個祕密，今天已時過境遷。那年秋天余先生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

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照相館，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一九七八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一九九三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整整二十年後，二〇〇三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






余英時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西山大屋故居，經過官方刻意整修的現今模樣。



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鮮少有中國人具備它。

「我是一九五〇年從羅湖橋（編按：深圳河上，連接香港和中國唯一一座鐵路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走過羅湖橋的時節，恰是眾多留歐訪美的中國高級學人紛紛「回國報效」之際，如華羅庚、熊慶來、趙九章、董鐵寶、陳夢家、冰心等，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權變更、個人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據統計，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誤判（選擇留在大陸），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誤判。這當中，便包括後來余英時考證的，陳寅恪對四九年未聽從夫人唐筼浮海之意的萬分追悔與愧疚。這些名士，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改造、凌辱、坑殺，便構成「反右」和「文革」的慘烈故事。

然而，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那叢林中的余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余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

懷，僅僅講過一次，是藉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只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 

註：標題句出孟浩然七絕〈夜歸鹿門歌〉。

### 蘇曉康

一九四九年生於西子湖畔，少年長於京城景山腳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啟示錄》開篇，引領「問題性報告文學」浪潮，嘗試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的寫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記者型報告文學」，且多為「硬碰硬」的重大題材，每每產生爆炸效應，為「新啟蒙運動」推波助瀾，兩度獲大陸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又據「廬山會議」敏感史料，作長篇紀實文學《烏托邦祭》，乃最早描寫大饑荒之作品。八〇年代尾聲，領銜製作《河殤》，把社會關注、討論、探索的各種命題、假說，都匯集起來，化為電視語言加以傳播，引起億萬人刻骨銘心的一次共振，成功地嫁接了思想和視覺、激情和理性，創造了一個新的電視片種，也攪起了一場全球華人的「文化大討論」。八九後流亡海外又遭車禍，孤榮二十年，為民請命大骨架散解，轉向療傷書寫，淺斟低唱人生終極命題，也呼籲奔走人散權，二〇一〇年秋領銜發起簽名呼籲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

